

小休采

方
修





小休录

方修



五洲文化企业

一九七八年九月·星洲

目 次

前记	1
----------	---

上 辑

略论“拼音汉字”	1
汉字改革问题琐谈	13
关于“双轨制”	23
画家赠我菊花图	28
王安石与苏东坡	35
一幅山水画	42
旧诗三首	46

元夜题槟城友人书帖

读冯伊湄遗著

答 C 君

一九七七年文艺活动纪略	观 止	48
-------------------	-----------	----

下 辑

最早出现的马华新文学作品——文学性时评	63
马华杂文的初期形式	72
马华记叙散文的初期形式	83
早期马华新诗一瞥	96
萌芽期马华小说补记	1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00084

马华文学研究文集

前 记

去年下半年开始，少写了一些短文；原以为可以抽出一段时间来多看点书或整理一点史料，没想到买药问医次数的增加，又把时间占去了，要看的书和要整理的东西，依然堆积在那里，似乎有增无减，实在没有办法。

但无论如何，出门逛街、购物找人的这一类无事忙，总是比坐下来动脑筋写文章轻松了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休息——小休息。本书就是在这种少写文章的小休息状态中编成的，所以书名就叫做《小休录》。不过“小休”一词也不是我的杜撰，《诗经·大雅》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话，可以视为它的原始出处。

然而，文章少写，书稿份量贫乏，编起书来，拼凑上倒也有点麻烦。不得已，只好再来打旧稿的主意。结果是仿照《人物篇》的编法，分为上下二辑，上辑是新近写的，下辑是陈年旧货。

几篇旧稿，写于六十年代中期，都是关于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史话。当时是打算作为《马华新文学史稿》初版本的补篇的，后来放弃了。关于这事，拙作《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前记》曾有一段话提到：“一九六五年初，我从工商学

校图书馆拍摄到一批早期《新国民日报》的影照，当即写了几篇《马华新文学史补》在报上发表。这种枝枝节节的修补，自然是不能满意的。其后，又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好些前此未曾见到的旧报刊，因而开始考虑修订全书的问题。”

现在，这几篇旧稿已经不能代表我对于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历史的看法，但一想起那一段风雨不改、天天赶到图书馆去翻阅旧报、拍摄稿照的倥偬的日子，又觉得它们有点好象鸡肋，弃之可惜。因为这里面的一些早期的马华新诗和散文作品，对于读友们可能还有点参考的意义。于是趁这次编书之便，把它们保留了下来；只删去若干已见于其他成书的片段。

至于收入上辑中的一些文字，虽然大多是去年才写成的，但此刻看来也有不少需要做点交代或补正的地方。由于太过琐碎，不想在这里喋喋了。只是《一幅山水画》一篇，却还可以多说几句。

这幅画，我后来终于送去重新裱过，加上一根小横轴，以利保藏。前些时，还写了一首七绝，算是画家的题画诗的和作：

世世捕鱼债未轻，海涯无计避徭征。

扁舟日夕风烟里，剩得高人赏晚晴。

可惜我与画家一向没有联络，不知道他现在何处，否则真想抄寄给他指正，看看会不会曲解了他的画意。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

略论“拼音汉字”

(一)

澳洲墨尔本大学物理系讲师卢述观博士，近期在本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汉字改革的新方案，提倡“拼音汉字”，引起了不少关注汉字改革问题的人士的共勉。

卢氏一方面是量子专家，曾在墨尔本大学物理系担任客座教授三个月。另一方面又是热心于汉字改革的工作者，除了已经发表过《拼音汉字：汉字的前途》等重要文章之外，在星加坡期间出席过多次有关汉字改革的演讲会，以及接受很多记者的访谈时，讲的也大多都是汉字改革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轻便的中文打字机，方案见于香港的《科技》双月刊创刊号。

卢博士设计的拼音汉字，原则上是半全形简化的，左边是形意或词类，右边是声母加韵母和调号。全部字母取自现行汉字，用法则不相同。譬如“尸”代表声母P，“人”代表V，“心”代表韵母i。根据这个方案，拼音汉字的“上”拼“字”，应写成“尸”字下一个“心”字，“音”字则是“人”下一个“心”字。

这样的一种设计，有优点也有缺点。这里先说优点。

略论“拼音汉字”

(一)

澳洲墨尔本大学物理系讲师卢遂现博士，近时在本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汉字改革的新方案，提倡“拼音汉字”，引起了不少关注汉字改革问题人士的兴趣。

卢氏一方面是核子专家，最近曾应邀来南大物理系担任客座教授三个月。另一方面又是一位积极的汉字改革工作者，除了已经发表的《拼音汉字》、《中文字的前途》等重要文章之外，在星逗留期间出席研讨会、演讲会、以及接受报章记者的访谈时，讲的也大都是关于汉字改革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轻便的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方案见于香港的《抖擞》双月刊创刊号。

卢博士设计的拼音汉字，结构上基本分为两部份：左边是形意或词类，右边是声母加韵母和调号。全部字母取自现行汉字，用法则不相同。譬如“尸”代表声母P，“人”代表Y，“心”代表韵母in。根据这个方案，拼音汉字的“拼”字，应写成“尸”字底下一个“心”字，“音”字则是“人”下一个“心”字。

这样的一种设计，有优点也有缺点。这里先谈优点。

“拼音汉字”的最大优点，是成为迄今为止各种采用汉字笔划来设计的拼音汉字中字形最接近现代汉字的一种。采用汉字笔划设计拼音汉字，本来不是新鲜的事情，早在清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如卢懋章的《中国切音字母》，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诀》，章炳麟的《组文韵文》，郑东湖的《切音字说明书》等都是。但写了出来大都有点象英文的速记或日本的假名，不象汉字。卅年代以后唐兰创制的新形声字，虽然进步得多，但因为渗入多量的“国语注音字母”，有些字在构图上还不如现在卢氏的“拼音汉字”来得美观。

(七七·一·廿四)

(二)

上星期谈过，卢遂现博士所设计的“拼音汉字”，是清末以来各种采用汉字笔划来创制的拼音汉字中形体最为接近现代汉字的一种，这是它的优点。因此，它也就保有现行汉字的一些优越性，诸如民族形式，构图好看，简洁有力而具对称之美，书写印刷的节省纸张篇幅等等。至于它的基本建筑祇是几十个符号，方便书写的机械化，则是一般拼音字的共同特点，那是不必说了。对于一些主张汉字改走表音路线、但又反对拉丁化（汉语拼音）的人，这个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愿望。

然而，这套“拼音汉字”的缺点似乎也很不少。最显著的是，所谓接近现代汉字，只是仿佛貌似而已，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把汉字的发展传统割裂了。它的一些表音符号，

表面上虽然取自现行汉字，但用法读法却是完全不同。譬如，“日”字在传统汉字中是形意的偏旁，这里改为声母，却又不读作“Z”，而是读“B”。又如，“尸”字不读“Sh”，却读“P”；“八”字不读“波”，却读“阿”；“七”字不读“雌”，却读“衣”：这就等于自创一套新字母了。

创造新字母的问题，许多语言文字学家是研究过的。结论是：“创造一套新字母不难，同意一套新字母却很难。使新字母符合技术性的要求不太难，使新字母符合社会性的要求，就决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新字母约定不易，俗成更难。创造新字母的尝试，在好些国家遭到失败，原因就在此。”

就这一点看来，卢博士的“拼音汉字”似乎反而不如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文字所采用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对于一般人倒还不至于那么的陌生。

(七七·一·卅一)

(三)

设计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如卢遂现博士最近所提出的“拼音汉字”方案，我以为是值得尝试的。但原则上应该和现代汉字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要割裂汉字发展的传统，不要使到人们认为那是一套完全陌生的东西，否则就无法胜过汉语拼音文字了。汉语拼音文字固然也是一种新的文字，但至少还有一个国际性的特点，方便外人学习汉语文，有利汉语文的扩展。

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文字学家唐兰曾先后提倡新

形声字。这套新形声字，因为采用了太多“国语注音字母”，以致许多字体构图很不美观，而且笔划轻浮，不够庄重。然而其中也有一部份，不但图形和现有汉字一模一样，而且设计上也能够和汉字的传统一脉相承。譬如字母“之”字，加企心旁代“志”，加木旁代“枝”字，加三点水旁代“治”字，这就完全建筑在现有汉字的基础上，和汉字发展的传统衔接得上，比较卢遂现博士的“拼音汉字”似乎更加合理些。虽然如此，唐氏的新形声字——也叫“切音文字”的提倡，在当时也还是受到批评，不为多数人所接受。

近年出现的一些同音代替的新字，如三点水旁加“九”字代“酒”字，加“七”字代“漆”字，又把“无锡”写作“无钊”等等，走的也是表音的路线。当然，这些字是属于简体字，不是拼音字；是个别字体的创制，不是象唐兰和卢遂现博士那样根据整套方案的系统的设计。然而它们的创制的方法看来却是更加正确，更易融入汉字发展的主流里面去。它们利用形意形声的偏旁都显得十分自然，使人们都觉得似曾相识。这倒是值得设计拼音汉字的学者们参考的。

（七七·二·七）

（四）

近日再看一遍卢遂现博士的“拼音汉字”——也称“拼体字”方案，觉得这个方案的提出，意义很好，想象力也强，但整个方向都是前人已经走过，碰了壁的。

原来，在五十年代上半期，当汉字改革的研究还没有决

定走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化）的道路的时候，汉字发源地的许多文字改革工作者，大都倾向于设计所谓“民族形式”的拼音字，四方八面提出的比较具有方块字形的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方案，共有一百多种。负责研究工作的一些专家，如罗常培、丁西林、曹伯韩等，也先后设计了好几种拼音汉字。但始终没有一种能够使人满意。摸索了五六年，这才死了心，决定放弃这一方面的钻研，改为推行汉语拼音文字。

当时，那一百多种比较象样的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方案，由于有些人要求拥有发明权，所以文字改革研究机构虽然不拟采用，但却代为保守秘密，大部份没有公开发表。不过从某些有关的论文或报告中，我们还是约略的知晓其内容。大致说来，这些设计和现在卢遂现博士的“拼音汉字”方案，都是大同小异的。

它们大都是强调“民族形式”，主张保留现有汉字的某些偏旁，希望能够一个对一个地取代所有汉字，因而可以用拼音汉字来翻译古书，阅读古书。——这是大同。

至于小异，则是五十年代的一些拼音汉字方案，比较照顾到汉字的传统；卢遂现博士现在提出的“拼体字”，则稍为西洋化了一点。以字母形式为例，前者是起用若干“国语注音字母”，或者是根据现行汉字的读音来设计；后者则以接近拉丁字母为准；从民族形式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是倒退一步了。

（七七·二·十四）

(五)

五十年代的一些拼音汉字的设计，拿来和卢遂现博士最近在本地提出的“拼体字”方案比较一下，也许是有点趣味的。

尽可能采用一些笔划简单的汉字做字母，这是前后期的不同方案的共通点，但设计方法则有差异。就声母方面来说，五十年代的一些方案是力求符合现代汉字的读音，如“比”代“B”、“之”代“zh”；还有士(sh)、七(c)、木(M)、片(P)等等，也是根据同一标准来制定。现在卢博士的方案，则是以字形近似拉丁字母为原则。他把廿一个声母的字形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几乎和拉丁字母相同的；如尸(P)、儿(R)。第二类是拉丁字母的倒转，如工(H)、人(Y)。第三类是和拉丁字母近似的，如日(B)、口(D)。第四五类是由于找不到和拉丁字母相似的汉字而自行创制的，如厂(s)、士(ch)。这些都是缺乏汉字造字的历史根据的。所以我说这样的方案较之前人的设计反而是倒退了一步。

在拼音法方面，我以为也是五十年代的一些方案比较优胜。它们大都摆脱了古代的反切法而采用了现代的直接的拼音法。如“太厄”迭写（加牛字旁），拼成“特”字；“比也”迭写（加挑刀旁），拼成“别”字。一般韵母的选择都基于同音代替，如“乙”代i、“也”代ie。找不到和韵母同音的笔划简单的汉字，则起用国语注音字母，或适当地另造一个新字母。

现在卢博士所设计的拼音法，基本上却是恢复古旧的反切法。因为三十多个韵母中除了为、也、于、月、王、文、元、云等寥寥几个之外，大部份只是取某一个字的最后一个音素作为拼音的根据；如八代 A、卜代 O、干等于 an、心等于 in。所以“汉”字要用工干来拼，“拼”字要用尸心来拼。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完全莫名其妙的。

(七七·二·廿一)

(六)

朋友问我，既然五十年代前期已经有了许多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的设计，为什么竟然没有一种能够使人满意，以致需要走上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化）的道路？

原因主要是这样——人们对于拼音字母，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为了阅读的方便，笔划要简洁，面目要清楚；二、为了书写的方便，要能横写，能从左到右一笔连写。而当时的大批拼音汉字方案，并没有一种能够符合这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难在笔划简洁和面目清楚要兼而有之。通常的情形是：笔划简洁的字母不见得面目清楚，面目清楚的字母又不见得笔划简洁。当时的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母的设计，一般上不出两个倾向：一、采用国语注音字母或类似的创制；二、采用笔划简单的汉字或兼用若干国语注音字母。可是，国语注音字母虽然笔划简洁，面目却不清楚。譬如代表“纳”和“科”、“特”和“雌”、“欺”和“eng”这几个音标的三对符号，写快了一点就不容易分辨了。至于汉字，

面目虽然比较清楚，然而笔划少、适合做字母者并不多；笔划杂了一点，却又不夠简洁。

第二个要求，就更难了。不论是国语注音字母或笔划简单的汉字，对于这个要求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的图形基本上是方块形式，组成方块形式的主要笔划是横竖交叉，由此又构成了写法上的左右收尾，而横竖交叉的笔划，左右收尾的写法，是和从左到右，一笔连写的要求不相容的。如果不采用横竖交叉的笔划和左右收尾的结构，则又完全失去了汉字形式的特点，失去了创造汉字笔划式的字母的意义了。

(七七·二·廿八)

(七)

又有朋友问我，既然五十年代的许多汉字笔划式拼音方案，提出来后都不适用，何以又说最近卢遂现博士的提倡拼音汉字是值得尝试的。

这理由也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

五十年代许多语文改革工作者提出的各种方案，因为有人要求享有发明权，文字改革研究机构虽然没有采用，却也代为保守秘密，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除了小部份见于若干专论或报告者之外，大多数方案的详细内容，我们都不大清楚。(有些人甚至连汉字改革研究工作对于汉字笔划式的拼音音有过长时期的摸索这一回事也不知道。)这就造成了近年来欧美的一些华裔学者提倡“民族形式”拼音字的热潮。澳洲的卢遂现、美国的袁晓园、纽西兰的孔宪中诸先生，在

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预见到汉语拼音文字的若干小缺点，却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汉字笔划式拼音字的更多的大缺点，因而先后设计了多种拼音汉字的方案。卢遂现博士的“拼体字”方案，就是其中的一种。（孔宪中的方案比较接近速记符号式。）这些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是在走着前人的复辙，结果可能发觉他们完全是在枉抛心力。但他们对于创造“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显出无比的热忱，他们把自己的设计公开出来供大家研究，不象以前的某些人那样要求什么发明权，这是值得我们尊敬与支持的。

另一方面，这些方案公开了出来，使到大多数人有了研究的资料，晓得什么叫做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这种拼音字的缺点在那里？这个方向何以会走不通？那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教材。虽然这并不是卢博士等人的原意。

（七七·三·七）

（八）

又一位朋友问：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除了字母的创制很难符合笔划简洁而面目清楚，又能从左到右一笔连写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外，还有什么缺点呢？

最显著的一个缺点，就是音标的拼写常常是以字母为单位，不是以音素为单位。这在拼写方言与吸收外来语方面，就将显得十分笨拙。现代许多国家的文字，音标的拼写大都是采用音素制的。就我们比较习见的英文来说，廿六个字母就是廿六个音素；有些音标只需一个音素，就以一个字母来

表音，如 *I*、*A*。有些音标需要三几个音素构成，就用三几个字母来拼写，如 *Uai*、*Uan*、*Ing*、*Ong*。这样，变来变去都不出廿六个字母的范围，不必另创新字母。所以字母可以减少到最低数目，音标却可以扩展到无穷无尽，从而在拼写方言与吸收外来语方面显得充份灵活。譬如广东方言的“吴”字和“牛”字，发音本来很特别，但英文一般上拼成 *Ng* 和 *Ngao*，就轻易地把这两个新音吸收过去了。汉语拼音文字因为也是采用音素制的，将来在某些规定的条件下，大概也能做到这一点。

一般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的设计，音标以字母为单位，形成一音一符，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它们对于单一音素的音标，固然是用一个字母来表音，但对于多个音素构成的音标，却就要另外创造一个字母来代表。以卢遂现博士设计的“拼音汉字”方案为例，单一音素的音标 *l* 和 *a*，字母是“七”和“八”，双音素的音标 *ia*，字母是“下”，三个音素的 *ian*，字母则变为“千”，四个音素的 *iang*，又是另外一个字母：乡。这样，字母比汉语拼音文字要多了一倍以上。将来在吸收方言和外来语的时候，每出现一个新音就要添造一个字母，更是不胜其烦了。

(七七·三·十四)

(九)

对于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的提倡，我的总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要求不高，不希望取代汉语拼音文字，只是希望设

计若干新的方块字以取代现行某些仍然难认难写的汉字，那也是有利于汉字的改革与发展的。不过卢遂现博士的“拼体字”方案，却还需要作一番修改。

首先，声母方面必须全部换过，根据现有汉字读音来设计，譬如用“八卜么弗”代表 **B P M F**，用“大太尼里”代表 **D T N L** 之类；纠正尽量迁就拉丁字母图形的倾向。因为既然是汉字笔划式的拼音字，讲究的是民族形式，那就完全不必要强求字母的图形与蟹行字相似。而且，方块字与蟹行字，构图迥异，根本无从求同。譬如“日口尸儿”，如果卢博士没有加以说明，人们绝对看不出它们和 **B D P R** 有些什么关联。何况，即使这样勉强撮合，结果也还是有些声母，因为找不到和拉丁字母相似的图形而要卢博士自己来创造，如弋 (**Q**)、士 (**ch**)。即使在图形方面完全撮合得来，却也把汉字的传统读音破坏无余了。例如日字读“波”，口字读“得”，工字读“喝”，乚字读“佛”，相信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

其次，拼音法也必须改善。应该采用现代的直接拼法，不应采用古旧的反切法。因而，许多韵母也就需要更换，改用直音代替，废除只求韵脚相近的办法。譬如 **I**，与其用“七”，不如用“乙”；**ia**，与其用“下”，不如用“牙”；**in**，与其用“心”，不如用“因”；**ian**，与其用“千”，不如用“言”，后者虽然笔划多了一点，却都是常用字，除了用作韵母之外，也可兼当单字使用。有些韵母没有直音可以代表，则不妨起用发音相近的常用字。如 **eng**，与其用“风”，

不如用“亨”；Ong，与其用“中”，不如用“丰”。

(七七·三·廿一)



汉字改革问题琐谈

(一)

友人张君，前些时邀了几个熟人闲谈，讨论汉字改革问题以及卢遂现博士最近提出的“拼音汉字”方案。当时，我主张汉字应该有两种：一是现有的方块字，或称老汉字；一是由汉语拼音发展开来的汉语拼音文字。前者可以进一步简化或进行同音归并等等，也可以渗进一些卢遂现博士所提倡的“拼体字”，或称新汉字。这样，两种文字双轨并行，经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五百年、一千年之后，让它们自然消长。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在汉字改革问题的争论中，方块字和汉语拼音文字都各有其热爱者，支持者，那就不妨让它们自由发展，自由竞争，让大众和时间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而且，在推行双轨制的期间，其中某一种文字可能会有长足的发展：或者方块字经过更合理、更有系统的整理之后，形成半拼音制度，更加易学易写；或者汉语拼音文字迅速地发挥出它潜在的优点，从简单粗糙到精微细密，从使用者都不大习惯到作文写话的运用自如。这样一来，人们就更加容易选择取舍了。

至于卢遂现博士所设计的“拼体字”，倘要作为一种独立的拼音文字来推行，那是问题多多，不是短期间内能够解决的。它也许需要有两套字母，仿似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许还需要一套完备的正字法，规定某些词汇的特别写法以及一般外来词的处理法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但如果不作取代汉语拼音文字的打算，改走另一个方向：修正一下方案，创制一些构图美观，而又不悖汉字形声系统的拼音方块字，加进现行汉字的主流里去，取代某些目前看来还是难读难写的老汉字，那却是可能行得通的。现行的简体字中的“衅”字，不就是一个很有独创性的拼音方块字吗？

（七七·三·廿八）

（二）

谈到方块字和汉语拼音文字可能会长时期平行并存的问题，偶然想起一件小事。

好几年前，我就曾在一段短文中说：如果汉文采用双轨制的话，则两种文字可能会在三两百年之内同时存在，同时使用。那段短文后来在收入一册杂文集、送给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被抽掉了。显然，那是认为这话太过怪诞不经的缘故。新旧两种文字双轨并行，怎么需要三两百年那么久？

当时，我只觉得汉字改革的前途，很难预测，大家看法不同是免不了的。现在想来，倒发觉了那段文字的确有点毛病，抽掉了反而是对的。因为，如果实行双轨制之后，汉语拼音文字不受欢迎的话，那么，这种文字很快就会被淘汰

了，根本不需拖上三二百年的时间。（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假定，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事。因为汉语拼音文字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泛使用的条件，它是不会正式推行的。）

只有在新文字广受欢迎，老汉字渐渐退居于古文字地位的情形之下，才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

最后这一点，我现在的看法还是不变。除非汉文不实行双轨制，否则，一种新文字取代一种历史悠久的老文字的过程，说它可能绵延三两百年，相信绝对不是什么奇谈怪论。朝鲜的谚文，不是使用了五百年以后才完全取代了汉字吗？而且这还是朝鲜一地的情形。在朝鲜，汉字现在还是大量使用着的。日本人，早已采用了拉丁化的日文在打电报，然而汉字夹假名的老传统，目前仍然是日本文字的主流；而且常用汉字，近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呢。

（七七·四·四）

（三）

在一个讨论汉字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向先生曾问卢遂现博士：“根据你这套（拼音汉字）方案，有没有办法代替一些古字？……看古书？”卢博士答道：“可以，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的汉语拼音就不行了。其实汉语拼音存在很多问题，别说古诗，就是新诗也很难翻，翻了大家看不懂”。

这个答案我当时没有留意听，近日看了一遍座谈会记录，觉得似乎有点问题。

我的看法是：汉语拼音只是“拼音”而已，并非一种文

字，当然无法取代古字，翻译古书；但“拼音汉字”也同样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拼音文字，不论是将来由汉语拼音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文字，还是现在卢遂现博士所提倡的“拼音汉字”，都只能是用来拼写现代人的说话，撰写和现代人的说话相近的文章（包括诗歌）。这也正是现代拼音文字的主要任务。凡是现代人不常讲到的词语，不常用到的句法，用拼音文字来写，那是一定难懂的。古文、古诗、以及和现代人说话完全脱节的“新诗”，用拼音文字逐字来翻，更是绝对的看不懂。“拼音汉字”虽然保留了老汉字的若干部首偏旁，在分别同音字方面可能比较优胜些，但也便宜不了多少。这只要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文或何其芳早期的一些新诗试翻一下来看，也就明白了。我想，翻新诗，汉语拼音文字应该比“拼音汉字”还更容易读懂。因为前者有分词连写的办法，后者没有。

拼音文字的推行，根本不是用来取代古字，阅读古书的。古书可以用现代语法、现代词汇来改写为拼音文字，但不是一字对一字的照翻。至于要直接阅读古书，那还是要懂得老汉字的。

（七七·四·十一）

（四）

几个熟人在一起聊天，谈到汉语拼音文字问题，我曾说，如果我们只把汉语拼音文字当作一些音标来看，阅读的时候是先从一个个的音标来思索原来的方块字是什么，那么，汉语拼音文字确是很难读的。我们应该把它当作自成系统的一

种文字，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文字来学，就象英国人学英文，马来人学马来文一样。也就是说，要使用视觉来认字，要慢慢熟悉它们的一个个的字形，这样，才说得上有了阅读的能力。

这是就一般人对于汉语拼音文字的一项误解而言的。有些朋友的确有这么一个看法：现在的汉语拼音既然是一种音标，将来的汉语拼音文字也将只是一些音标的串合，一个会讲汉语、晓得老汉字的人，只要学会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法，就应该能够顺利地读出字音，了解字义。如果汉语拼音文字不是这么好懂，那就是这种文字根本不能读懂，不能使用，也就是它的缺点。

这些朋友没有把汉语拼音文字真正当作一种文字来看待，只认为那是方块字的音译，学会了拼音就可以读书看报，可以省掉学习一种文字所必经的认字的过程，可以不必付出相当的劳动就轻易地掌握了一种求知的工具。其实世间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英文和马来文，都是拼音文字，然而英国人学英文，马来人学马来文，都还是要一个个字地认，一个个字地学。只是他们的字比较读音没有一定规律的方块字易认易学一点吧了。我们将来对于汉语拼音文字，也需要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的学习，没有平步登天的捷径。

(七七·四·十八)

(五)

一个朋友听说将来的汉语拼音文字，也需要一个个地

认、一个个地学，不禁大表惊异道：“不是说一个人只要懂得二十多个字母，以及拼音方法和声调变化，就能够读懂一般文章吗？”

我说：是的，理论上确是如此。但这是指慢慢地拼读，不是指熟练的运用。我们读书看报，一小时如果没有一万几千字的速度，那根本无法应付日常阅读的需要。要求阅读能够顺利进行，却就必须熟悉每个字的字形，使到一些字汇一映入眼帘，就立刻了解其文义，不必常常停下来思索或查字典。要达到这么一个程度，无论任何一种文字；都非一个个地摸熟不可。

这个道理，我们平日阅读英文报章的经验是很可以做参考的。通常，在看西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整个的字汇，不是每个字里面的个别字母；我们一打开报纸，就是通过视觉来接受一个个的熟悉的字形，从而了解整个句子的内容，不是首先在喉咙里拼读它的每一个音节，然后通过有声或无声的发音来确定它的字义。如果是这样，那么，一段小新闻，就要读个大半天，其他的许多事情都不必做了。

我们将来学习汉语拼音文字，至少也需要达到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当我们阅读汉语拼音文字的书报的时候，这些读物打进我们脑海里的，首先是一字一句的印象，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字母或音标。所谓“至少”，就是说这是最低的要求，还不能算是熟练的运用，还没有包括写作上的“胜任愉快”。要用汉语拼音文字意到笔随地写文章，那又需要再下一番练习的工夫了。（七七·四·廿五）

(六)

读友M君问：“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将来对于汉语拼音文字，也要一个个地学习，一个个的摸熟，那不是和现在学习老汉字的情形差不了多少吗？”

我说：对于南方人——如闽粤潮客各籍人士来说，学习汉语拼音文字，比较学习老汉字，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便宜。因为老汉字可以用方言学，汉语拼音文字却不能用方言学。汉语拼音文字的前身——拉丁化新文字，曾有多种拼写方言的方案的设计，某一地区的华人可以选择特定的方案，按照他们的方音来学习，那就非常容易。现在的汉语拼音文字却是拼写普通话的；不但没有拼写方言的方案（至少目前是没有），而且是作为一种普及普通话的工具来推行。那么，南方人学习拼音文字，就要花费双层的功夫：先学普通话，再学汉语拼音文字；或者是普通话和拼音文字同时学习。

还有一点困难是，普通话有些发音，南方人需要特别练习。否则，阅读方面还不成问题，写作的时候就大大伤脑筋了。譬如，“知蚩诗”和“资雌思”，那一个字是翘舌音，那一个字不是？“安”和“昂”、“因”和“英”，那一个字有鼻音，那一个字没有；那一个字是n收尾，那一个字是ng收尾？这些，如果不多查字典，就要常常搞错的。所以，南方人学起汉语拼音文字来，就比较麻烦一点。

然而，对于北方人来说，这类困难基本上都不存在。他们学习汉语拼音文字，一般上将好象英国人学习英文，马来人学习马来文一样的便捷。而北方人（根据语音系统来区

分)，却是占了全华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总的来说，华人学习汉语拼音文字，比起学习老汉字来，进度是快得多了。（七七·五·九）

（七）

谈到华族的南方人学习汉语拼音文字的困难，偶然想起前些时吉隆坡陈初荣先生的提倡“现代华语拼音”。陈先生创制的“现代华语拼音”，对于声调变化，拼写方法复杂繁琐，大家都不敢苟同。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主张废除普通话的翘舌音。也就是说，“知蚩诗”和“资雌思”不再区分。这说明了陈先生也是发觉到南方人学习汉语拼音文字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但却是完全站在南方人的立场来说话。

我以为，如果单单为了照顾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方便，则不但“知蚩诗”和“资雌思”可以不分，“安”和“昂”、“因”和“英”更应该同一。因为这一类发音的区分，对于南方人来说是全无标准可言的。

然而，就华族的语音系统来看，北方人较之南方人，在人口上是占了压倒的优势。要绝大多数服从极少数，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再说，普通话的音值本来已经不多，如果再把若干比较特殊的发音废弃，那么，音值就要更加贫乏，同音字的问题也更加严重了。而且，“知”“资”不分，“安”“昂”不辨，讲起话来也不好听，失去了普通话原有的韵味。

其实，南方人学习汉语拼音文字，即使要比北方人多费一层工夫，但比起学习老汉字来，无论如何还是方便得多。因为汉语拼音文字是走表音路线的，至少是易读易认；而老汉字的读音却是没有规律可寻，每个字都要生吞死记。

旧同事 K 君，近时去帮书局编词典。问他况味如何，他说：“钱确是很难赚，常识上倒获益不少，纠正了以前许多‘有边读边、无边读中央’而读错了的字音”。这种读错了字音而不自觉，要待通过字典来纠正的情形，将来学习汉语拼音文字的人，就都可以避免的。

(七七·五·十六)

(八)

前些日子，和几个朋友在谈论汉语拼音问题的时候，我说：将来，汉语拼音文字推行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和习惯也要改变；特别是文风，或者说是文章的写法，更非改变不可。象鲁迅的那种文言气息很重的作品，如果照样写成汉语拼音文字，那是谁也看不懂的。

这也是就一些人对于汉语拼音文字的一项误解来说的。有的朋友把汉语拼音文字看成老汉字的逐个替代或对译，以为我们现在怎样写文章，将来推行拼音文字之后，也还是那样的写文章。写了出来，如果大家看不懂，那就是拼音文字的毛病。

其实，文字改革是应该和文风的改革同时进行的，否则必然是事倍功半。要推行拼音文字，文章就不能好象我们现

在所习见的那样，写得半文不白，追求简炼古雅；而是应该浅白明畅，接近口语。拼音文字的主要功用就是“写话”，写我们当代人的话。凡是和当代人的说话距离太远的遣词造句，照样写成拼音文字，读起来就必然有困难。这并不是拼音文字毛病，认真说来倒是文章写法上的毛病。

当然，鲁迅的文章，如果照样翻成汉语拼音文字，也不是说每一篇都无法看懂的。我想，好象《死》里面的那七八条遗嘱，应该是看得懂的。但如果象《华盖集》的《题记》那样：“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或者如《忆韦素园君》的最后一段：“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那大概就只能看懂五六成而已。

（七七·五·廿三）

关于“双轨制”

(一)

读友E君问：为什么你断定将来的汉文会出现双轨制？双轨制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

所谓将来的汉文会出现双轨制，那是假定汉语拼音文字将来会被推行的一个构想。因为，汉语拼音文字推行之初，料想老汉字还有许多人要学要用，实际上老汉字也还有许多用途，诸如阅读前人作品、研究历史事迹等等，所以，除了让老汉字和拼音文字在一个长期间同时存在而自然消长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双轨制了。

至于双轨制的具体情况，我想，许多通销的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重要的文献、政令、通告，都会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老汉字的版本，另一种是汉语拼音文字的版本。熟谙老汉字而不大懂得拼音文字的人，可以选看汉字版本；不谙老汉字、但却懂得拼音文字的人，则可选看汉语拼音文字版本。因而，普通人只要学会老汉字或拼音文字的其中一种就够了，不必两种都学。当然，两种文字都学，那是会更好的。

学校方面，至少在小学阶段，可能会有两种班级，一种

偏重教老汉字，另一种偏重教汉语拼音文字，学生可以选读其中一种。大概，第一代的学生，还会有一半选读老汉字的。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选读拼音文字的人数便会逐渐增加。至于中学阶段，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想仍会偏重老汉字的教。到了大专阶段，特别是文科的学生，由于要直接阅读历代的古籍以及现代的白话作品，恐怕是百巴仙要以老汉字为教学媒介了。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想，不一定会符合事实的。

(二)

读友 N 君又问：许多地方的旧制的度量衡被公制取代了，都不必有所谓双轨制，何以汉语拼音文字取代老汉字，就一定非有双轨制不可？

这里必须再度说明，汉字的改革方案，可以有多种多样，将来要怎样发展，可能还是个未知数。我所作的双轨制的构想，只是建立在汉语拼音文字会被推行的假设上。如果汉语拼音文字将来并没有推行，而是采用其他的改革方案，则情形就会和我们的构想不同，汉文的双轨制就不一定会出现。现在是时候未到，谜底未开，大家都不妨瞎猜。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瞎猜，才有一点趣味。到了有朝一日，事实摆在眼前，鱼清水定，反而是没有什么好谈了。国际时局的瞻望观察，足球比赛的赛前预测，常常比较既成事实之后的评论来得热闹，也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谈谈度量衡的改制。我以为这和文字的改革完全是

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度量衡的改制如果进行得不圆滑，最多只能引起市面买卖上的一点紊乱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文字改革工作如果搞得不好，那就整个社会都要陷于瘫痪状态了。我们假定，现在有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宣布，明天开始，所有度量衡的旧制都不用，改用公制；所有老汉字的读物都停止发售和印刷，改用汉语拼音文字印行书籍报刊，发布政令通告。好，一宿醒来，情形如何呢？我想，那些不懂得公制的人，仍然可以买到东西，不成问题。而大多数只懂得老汉字的人，可就变成文盲了：报纸新闻看不懂，政府文告看不懂，交通条例看不懂，社会动态与世界大事都茫然无知……。这么一来，整个大城市，岂非成了昏天黑地，而且秩序大乱了吗？

(三)

读友N君再问：度量衡的改制和文字改革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罗马化马来文和汉语拼音文字却是性质相同；何以罗马化马来文取代爪夷文并不需要双轨制，而汉语拼音文字取代老汉字却就一定有此需要？

马来文的情形，我不熟悉，无从解答。至于汉字改革的特别需要双轨制，我想这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可能有些关系。如果汉语拼音文字取代老汉字没有一段双轨并行的过渡时期，只靠一纸通令，宣布即日起使用新文字，废除旧文字，那么，一时之间，读书界要到那里去找一部《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或者《鲁迅全

集》的拼音文字读本呢？还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更古老的作品的新读本，又要到那里去搜购呢？要把前此大批用方块字写成的文学名著改写成拼音文字，即使是节本，也要百几十年的时间哩！

其实，罗马化马来文取代了爪夷文，也不见得没有出现双轨制。据我所知，十九世纪下半期，星马地方就已有若干罗马化马来文书报的出版。如一八七五年前后，曾锦文（？）曾在檳城将《三国演义》等中国旧小说翻译为罗马化马来文；一八九四年，宋旺相则在新加坡发刊罗马化马来文日报《东星报》，历时一年。可见罗马化马来文和爪夷文的同时存在，至少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不但马来文的改制有过双轨制的时期，度量衡改制也是不免出现双轨制的。在新加坡，现阶段，就是度量衡的公制和旧制双轨并行的时期。汽油站卖油用公制，巴刹小贩卖鱼卖肉论斤计两；百货公司以至杂货店卖的东西，不是有用公制的，也有用旧制的吗？

（四）

N君提出他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在汉语拼音文字推行的初期，采用汉字夹拼音的办法，先由一些表音词、音译地名人名、以及科技名词开始，渐渐扩及普通词汇，终而过渡到纯粹的拼音文字，不是就不必出现双轨制了吗？

汉字夹拼音，也可以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途径。然而它的功用，只能是部份地弥补汉字表音功能的缺陷，以及减少汉

字使用的字数而已，并不能根本解决汉字改革的问题。因为老汉字和汉语拼音是两种不同形体的字，拼音夹得太多了，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不象日本文的汉字夹假名那么平滑融洽。而且，即使发展到好象日本文那样，减少了大量汉字的使用，也仍然无助于书写的机械化。再说，汉语拼音文字有它的一套正字法，如分词连写之类，和老汉字的一个紧接一个串成句子的写法完全不同，两者夹缠在一起，反而不利于汉语拼音文字的发展。如果废除汉语拼音文字分词连写的办法，只用一个个的拼音逐一取代老汉字，则量数一多了起来，文章就看不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欧美各地的许多华裔学者，要另外提出一些汉字笔划式拼音字的方案的缘故。这些方案保留了汉字的若干部首偏旁，希望逐个取代汉字之后，文章仍然易于看懂。（其实这也是一个幻想。）

N君说：“现在的简体字取代了繁体字，文章都看得懂，为什么汉语拼音一取代老汉字，文章就看不懂？”我的答案是：简体字和繁体字是同一系统的表意文字，简化的方法又大多是除头去尾，以局部代替全体，不是以音代形，所以不易引起混乱。如果是大部份采用同音代替的办法，变成“别字连篇”，那也是会有问题的。

（一九七七年六月）

画家赠我菊花图

(一)

画家H先生送给我一幅淡彩画。画的是几丛浅黄色的菊花，枝影横斜，似乎在金风玉露中有点不胜其寒的样子。下面是一大块欹石，三两条曲槛，调配得宜，疏落有致，的确是大手笔。画的右旁还题了一行“雪芹句”：“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秋”。

这是曹雪芹替贾宝玉写的诗。《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大观园的一批青年男女发起组织诗社，持螯赏桂，作者当时就替宝玉写了两首七律，一首《种菊》，一首《访菊》。上述两句就是《种菊》中的警句。全诗八句如下：“闲趁霜晴试一游，酒杯药盏莫淹留。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怜诗客，休负今朝挂杖头”。

菊花诗，古人的佳作太多了。陶潜的隐逸气与黄巢的叛逆型，可说是代表了不同风格的两个顶峰。曹雪芹的这一首，则是另外一种境界。

对于花卉草木，我一向不懂得欣赏，所以也没有什么偏爱，寒带的松涛梅林，赤道的椰风蕉雨，我都同样看待，无

所轩轻。只是由于在旧诗词中多接触到一些咏菊的作品，对于菊花的印象不觉深了一点。因而画家赠我菊花图，我是衷心欣喜的。

不料带返家里，再展开来观赏一回时，两个小孩子却批评了起来：“咦，菊花！怎么不画胡姬？”原来我们的左邻右舍，种的多是胡姬，有红有紫，沿着绿色的篱笆亭亭玉立，煞是好看。篱边还有许多玫瑰，九重葛之类，更是红得发紫，鲜艳夺目。孩子们看惯了这些大红大绿的花草，对着清淡朴素的黄菊，自然觉得不大醒眼了。于是有诗为记：

黄蕊疏枝槛外斜，但凭淡彩写名花。依然不及胡姬好，
姹紫嫣红倚绿笆。（七七·六·廿七）

（二）

关于菊花图，还有一段小文章可写。

起初，我以为菊花是寒带的植物，本地不易见到，所以猜想■先生写给我的，大概不外是霜前月下生活的回忆，或者是设想中的怡红公子拄杖种菊的背景。另一方面，我也想起一个已故的搞油画的朋友。他经常批评一些中国画的画家，说他们的作品不是向壁虚构，就是前人的作品的临摹，没有地方性，没有热带色彩。我个人一向比较赞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地方性并不等于地方的景象，而是应该包括所有与地方社会及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但即使采取这么一个观点，菊花图的缺乏热带色彩，也仍然是事实。这么想着，再看看窗外篱边的红花绿草，忽然觉得有点“灵感”，

终于凑成了一首打油诗：“月下霜前冰玉姿，炎荒万里送清思。鸡冠摇首牵牛笑，都说先生不识时”。

接着，却就发觉自己是错了。因为有个同事告诉我，星马也有不少菊花，那是金马仑高原的花农培植的，本地武吉智马一带的花圃就都有卖。日前他的家里还买了一盆，只花三块钱。据说可耐三个星期，不会枯萎。

这么一说，我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焉知画家写的菊花图，不是金马仑高原的佳景，或者是从本地的花市得到的灵感？至少，在今天，吃螃蟹，看菊花，已经是热带的人们也可能有的赏心乐事；热带的画家画菊花，也不能说是虚构的题材了。

因此，我把我的打油诗彻底改了——

冷艳晚香入丹青，传神妙笔自清新。

年来南国多佳种，岭上秋光助写真。

（七七·七·四）

（三）

因为看了菊花图，偶然想起古人的一场关于菊花的小争论，附记于此，以为谈助。

有一则宋人诗话，说王安石曾写了两句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见了，笑他不通，因为什么花都会凋落，独有菊花是在枝上枯萎，不会满地飘零的。于是依韵续了两句，跟他开玩笑：“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但荆公并没有认输，他反驳道：“是岂

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

菊花究竟是不是也有落瓣的？这实在是个有趣的问题。欧阳修是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所以续了两句诗来挖苦诗人。但王安石却反过来笑他“不学”，不知道屈原就曾经“餐秋菊之落英”。

后人评论这一段古，大都是支持欧阳修；认为菊不落华，蕉不落叶，是自然的定则。至于“夕餐秋菊之落英”，应该另作解释。

怎么解释呢？有人说，屈原并非真的有什么落英可餐，只是故意虚构落英这个反常的现象来为自己的身世解嘲，意谓：“菊花是就枝而损，本无落英，而现在竟然损落，则我屈原的本来不应被放逐，而现在竟然憔悴地浪迹于楚泽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有人则说，屈原确是真正吃起菊花来的，但这菊花并不是自落的，是屈原把它摘落的。又有人说，“落”是“始”或“初”的意思，譬如大厦刚刚建竣，叫做“落成”。那么，屈原所吃的落英，实在是“初英”，即新开的鲜嫩的菊花，不是凋落下来的残菊。再有一说，认为屈原吃的并非秋菊之花，而是秋菊之叶，“英”是叶的意思，《神农本草》说过，三月采菊叶服之，轻身耐老。

最后这一说最奇怪，按照它的解释，屈原倒是在流亡颠沛中仍然每夕不忘进补，把菊叶当作贺尔蒙来服用呢！

（七七·七·十一）

(四)

有一个读者问：“关于王安石的菊花诗的论争，我前些时才听某地一个播音公司的讲古先生说过，另一主角明明是苏东坡，你怎么说成欧阳修了？”

答案是这样——有关故事，最早大约见于两种诗话，一种是《西川诗话》，另一种是《高斋诗话》，内容略有不同。前者说是欧阳修替王安石续诗，后者则说是苏东坡。我所引述的是前者。冯梦龙编写的《警世通言》，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却是采取后一说法。播音公司的讲古先生讲的，大概就是这个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在诗话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情节，诗句也有了若干改动。故事是说，苏东坡因得罪了王安石而去湖洲做官，三年任满回京，“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由于王丞相昼寝未醒，乃在书房小坐。偶见砚匣下露出些纸角儿，取而观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得是荆公笔迹，题为《咏菊》。两句诗写的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心想：王安石的诗怎么愈写愈差劲，以至于完全胡说八道呢？因为黄花即菊花，开于深秋，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老去了也只是在枝头焦乾枯烂，并不落瓣。说什么“吹落黄花满地金”，岂非大错特错。于是举笔舐墨，按侵韵续了两句：“春花不比秋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接着，便被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有一天，赴花园看菊，恰好是重阳连日大风之后，只见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不禁吓得目瞪口呆。这才知道菊花确是有落瓣的，王安

石并没有说错，反而是自己的续诗太过孟浪了。东坡因此十分后悔，赶快借故进京，去和老太师道歉。

小说比起诗话来，内容确是热闹得多，但也去史实愈远了。（七七·七·十八）

（五）

写了两则有关菊花的小故事，觉得还有一点话题可说。

屈原到底有没有吃落英？吃的是初英还是残菊？是菊花还是菊叶？是为了疗饥还是为了进补？他本人早已沉到汨罗江底去，无从当面请教了。但有个问题还是值得弄个清楚：是不是任何品种的菊花都是虽枯不落的？

与王安石发生论争的，不论是欧阳修还是苏东坡，其实都是诗话作者的道听涂说或冯梦龙一流的小说家言，根本没有这回事。《西清诗话》和《高斋诗话》所录的续诗，《渔隐丛话》就指出道：“于六一居士全集及东坡前后集并无此二句，不知西清高斋何从得此”。至于《警世通言》的引伸铺排，那是十足的文学创作，更加不能信以为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作者指出了一点：黄州（在湖北省）的菊花是落瓣的。

如果这是事实，则又说明所谓“蕉不落叶，菊不落华”，并非什么自然的定则；“残菊飘零”的现象有些地方确是存在的。那么，屈原所餐的“落英”，可能正是从枝上掉落下来的秋英。

日昨，H先生来电话相告，在中国，因为幅员辽阔，各

地气候不同，菊花的生物状态颇不一律，有落瓣的，有不落瓣的。我们读旧诗词，也可见到有落瓣和不落瓣的两种描写。但一般上以不落瓣者为多。前年有香港来客送他一盆，后来就是在枝上枯萎的。不过，在本地，菊花却完全是落瓣的品种。这也可见花开花谢的情形，确是因地制宜。

我想这个说法最合乎事实。看来，屈原即使真的吃起菊花的落瓣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一向来许多围绕着“落”字大做文章的笔墨官司，似乎是可免则免了。

(七七·七·廿五)



王安石与苏东坡

(一)

因为谈论关于菊花诗的小论争，联带想到《警世通言》那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小说对于王安石的描写，似乎比有关的诗话高明得多。

一些诗话的作者，谈到菊花诗的论争时，大都是倾向于诋毁王安石。例如吴景旭的《历代诗话》，就有过一段议论，大意说：欧公因见安石误处尽多，故特唤醒他“仔细吟”，不可过执己见，莽莽行事。

但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个短篇中，荆公却是一个胸襟恢廓、见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这是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另一方面，小说把苏东坡写成一个嘴尖舌薄，喜欢卖弄的浅陋文人，虽然有点过火，其实却是故意要长王的志气，灭苏的威风，充份表现出小说作者臧否人物的卓识。

宋神宗初年，王安石积极推行变法，那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一般农民的进步措施。但苏轼却追随司马光等世族豪强组成的反对派，对王展开猛然的围攻。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论时政书》……等大文章，全面否定新政的基本内容，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又

把新政形容为毒品，“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此外还骂荆公不顾人言，将象商鞅一样作法自毙。虽然他和司马光等大地主本质上有所不同，思想比较开明；在杭州黄州等地做官时，也先后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晚年还一度倒过来反对司马光，以致两面都不讨好，遭际更加坎坷；但总的说来，毕竟还是一个新法的破坏者，比起披肝沥胆，献身变法运动，对历史起着促进作用的王安石来，那是渺小得多了。小说作者因此抑苏扶王，一反一般腐儒的偏见，的确是有点了不起的。

（七七·八·一）

（二）

重读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觉得《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篇，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糟粕；而那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有意抑苏扶王，倒是写得很精彩。不过作者在处理王安石和苏东坡这两个人物形象方面，也还有若干缺点。兹举一例于下。

小说写苏轼左迁黄州团练副使，是因改菊花诗冒犯了王安石的缘故。这样的写法，显示王安石有意教他亲自到黄州去看菊花，确是增加了不少趣味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王安石的形象，使到读者觉得此老未免有点公私不分，小题大作。事实上，苏轼那一次的谪贬黄州，是由于他作诗抨击新政，受到谏官弹劾的结果。

元丰二年三月，谏官何正臣开始纠劾他“愚弄朝廷，妄

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辄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到了七月，舒亶、李宜之、李定等人又连上弹章，历数他的罪状。于是被捕到京，八月入御史台狱。当时舒亶向皇帝提出的控状，曾说：“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及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这话虽嫌有点断章取义，但也不全是“莫须有”的构陷。后来，还是神宗可怜他，关了他三个月，就释放了，贬到黄州去做官。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所以，苏轼当时的外放黄州，固然是由于作诗惹祸，但惹的是讥评朝政的祸，和王安石的什么诗稿毫无关联。小说虽然不等于历史，但也不应太过歪曲历史。

(七七·八·八)

(三)

上星期谈到《警世通言》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篇小说在处理王安石这个人物形象时的一个缺点。这里再谈苏东坡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上的失当。

小说中写苏东坡在黄州见了菊花落瓣，自知改诗的错误之后，赶紧找了个冬至节进贺表的理由，上京去向老太师赔罪。这个写法给予读者一个印象，认为苏东坡倒是一个勇于

认错，过不惮改的人。这就削弱了作品的“抑苏扶王”的主题了。就历史上的真实而论，苏东坡也不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例如，乌台诗案审结后，苏无罪获赦，充黄州团练副使，他立刻写了两首骂人的诗：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偶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十二月廿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二首》）

这里，没有一句虚心的检讨，想想本身的口诛笔伐，反对新政的行为是对抑或不对；只是一味自吹自擂，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第一首是表示作者宽宏大量，不欲追究此番文字之累；真正追究起来对于别人反而是不方便的，因为那些人都是尸位素餐的“窃禄”者。第二首是说自己因为声名赫赫，将来恐怕又会有文字祸的发生；但还是不欲象别人一样去学那长安城里的斗鸡少年，充当皇帝的弄臣。

此人的顽固死硬，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八·十五）

王安石的改革，使许多士大夫感到威胁，他们纷纷上书反对。苏东坡是其中之一。他写了一首诗，讽刺王安石。（四）

上回引录了苏东坡谪贬黄州之初所写的两首诗，说明历史上的真实的苏东坡并非一个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人，而

是一个始终反对变法的顽固份子，《警世通言》那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并没有写出他的这种性格。

当然，苏东坡的诗也不是完全在自捧和骂人，他并没有忘记吹捧他的弟弟苏辙。“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就是特意表彰苏辙的义行的。原来，东坡下狱时，苏辙曾乞削职代兄赎罪，不准，贬筠州（江西）监酒。苏辙本来是在河南应天府做官的，应天府在唐时为睢阳，所以说是“睢阳老从事”。

苏辙为了救兄而贬官，东坡自然很感过意不去，怀念之情也就更加深沉殷切，因而使到他在黄州时写的那首《水调歌头》的中秋词成了“赏月怀人”的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的题目下面，自注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由就是他的弟弟苏辙，也就是那个“为予投檄到江西”的“睢阳老从事”。

就词论词，的确是不可多得之作。难怪《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至于内容，可就不是所谓“兼怀子由”那么简单。作者在这里向神宗皇帝打了一下三索，又连带告了别人一状。据说，此词作后，都中传诵，内侍录以进呈神宗，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大为感动说：“苏轼终是爱君！”于是传令将他改移汝州，算是给他一个较好的差事。可见苏东坡不但善于利用他的诗词来反对变法，讥谤朝政，也善于

利用它来打三索，告御状。这也是历史上的真实的苏东坡的性格的一面。（七七·八·廿二）

（五）

读《苏轼诗选》，觉得还有一件关于苏东坡的事值得补述。

神宗皇帝对待苏东坡，可说是不错的。乌台诗案，对于苏东坡本来十分不利，但神宗予以特赦，后来又把他从黄州调到汝州，给他一个较好的环境。按照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来说，苏东坡应该是感恩图报才对。但事实不然。元丰八年五月，东坡由汝州罢职，归休宜兴。时神宗刚逝世两个月，全国官民都还在为皇帝驾崩举哀，他却意态欢欣，诗兴勃发，大事描写其退休之乐——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菟栗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

这三首诗后来也招致御史们的弹劾，说是“先帝厌世，轼别作诗自庆”。其中第三首尤为严重。皇帝死了，诗人却自称“闻好语”，连“野花啼鸟”也都“欣然”，那还不是有意和皇家作对么？实际情形是当时有人买田给苏轼，轼喜而作诗。“闻好语”云云，指的就是得田的事。但这种事又

怎能拿来替自己辩护呢？好在这个苏学士绝顶聪明，终于给他想出一个自辩的办法——拍新皇帝的马屁。于是推说是岁五月初前往扬州竹西寺途中，看到百姓父老十数人道旁笑语，一人以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因为“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所以作诗。

这一拍可拍个正着，新皇帝哲宗飘飘然地让他过关了。但无论如何，苏东坡在国丧期间表现得那么轻松愉快，至少可以看出他对于神宗皇帝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七七·八·廿九)



一幅山水画

(一)

我的手头有两幅彩墨画，都是“非买品”。一幅是最近提到的H先生的菊花图，另一幅是一位未曾谋面的L先生的山水画，十年前承友人C君的好意，转赠给我。

这是一幅工笔画，描写向晚时候一个水乡的景色。画的中间是一条弯斜的大河，水平岸阔，一个渔夫驾着一叶扁舟，似乎归心似箭。河的右岸是远景，层峦叠嶂，暮霭沉沉。河的左边是近景：一大片斜坡上面，乱石岣嶙，林木葱郁；绿荫深处，有两间小红屋，大约是高人逸士隐居之所；屋外不远，一方石崖，屹立河滨，崖上坐着两个老者——也许就是隐士，好象正在欣赏那天边的落日。但河面上的舟子却没有隐士们那么轻松悠闲。他正在溪流中挣扎前进，四顾苍茫；家，还很远呢。画的左上角，画家题着一首绝句，显然是替他吐露了深沉的心声：“钓罢归来一叶轻，蓑衣箬笠水兼程。半生原惯冲风雨，那识人间有晚晴。”

画家L先生，据知是某院校的讲师，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港台应聘来星执教。嗣后聘约期满，离星他去，留下两幅画给他的学生C君，说明一幅送给C君，一幅由C君送

给任何他认为适当的人。六十年代中期，我要搬家，C君就把画送来，也许带有一点“恭贺乔迁之喜”的意思。

C君说，画家的别署叫做“革命世家”。原因是他的先辈，包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忠贞之士，参加过同盟会，帮助孙中山先生打倒满清的。果然，在画的左上角和右下角，我就发现有两个小印章，其中一个就是“革命世家”四个隶书。另一个刻得很古朴，字划看不清楚，我想是画家的原名吧。

(二)

对着十年前友人C君转赠给我的一幅山水画，我深深地感到愧咎。因为保藏不善，好好的一件美术品，已经弄得有点破损了。

画本来是裱了一层绫布，装在玻璃镜里的。当初，C君把画送来的时候，还说他已去函征得原作者L先生的同意；L先生在回信中，又开玩笑地表示庆幸他的“名画从今有主”。然而，画家的估计完全错了。他的画跟了我这个主人，其实是大大的倒霉。我的居处虽然不算湫隘，却是四壁都堆满书架，或者挂着孩子们读地理课不时需要参考的地图，一时腾不出一个空隙来安插它，于是就摆在书架的上面，斜靠着墙壁，心想这和在壁上钻孔钉钉，悬挂起来，也是差不了多少的。不料过了不久——大概只有半年多些，一个晚上，一只小猫冲上书架去抓壁虎，便把玻璃镜打破了。之后，这画就更加遭殃。它有时被卷了起来，藏在书橱里；

有时用纸包着，平放在书架的顶端。因为我想再买一个玻璃镜来装置它，但我经常去买书买药的几条大街小巷，却很少见到玻璃镜店；有时见到了，却又忘记了画的大小尺寸。另一方面，我又想到请人把画改裱，装上一根小横轴，方便收藏，也许会更好些。这样，整十年间，便一直因循迁延下来。到了最近，终于决定改裱，取下来细看时，这才大吃一惊。画面上不知怎么出现了几条深长的绺痕，又有了一两处轻微的擦损，还不知从那里渗进来一层薄薄的灰尘和好些小跳蚤。看来几乎面目全非；画家的一片心血，险些被糟踏掉了。

倒是C君已经逝世，画家也远在千里之外，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情形；否则，真不知道要感到怎样的痛心呢！

(三)

由于保藏不善，险些把人家送给我的一幅精致的水山画糟踏掉了，这个经验使我有了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象我们这些喜欢买书藏书的人，对于悬挂字画、欣赏字画，几乎是注定了没有缘份。

书籍和字画，看来只是一些纸品，不是什么粗重的东西，但一摆放开来或悬挂起来，却是很占地方的。如果是大户人家，厅堂书房，两皆宽敞，高大的书架和大幅镜屏画件，自都不愁没有空间可以安置。但一般人的居处，毕竟面积有限，通常只有一个小客厅或小房间可以利用，要想展挂字画，就不能太多的蒐购书籍。否则，只需十个八个书架，

便把屋子的四壁都挤得满满的，别说挂起字画，就连画件的收藏也成问题了。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我参观过几个朋友的住所，光景也好不了多少：那些买书买得多的，几乎都不悬挂字画；而墙壁上多了几件字画的，则藏书都不丰富。那些不悬挂字画的朋友，也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关系，买不起字画；主要还是因为书籍和字画都非有地方来容纳不可，藏书逐渐增添扩展的结果，字画就被挤掉了。这也连带影响到买画藏画的兴趣。

此外，我还觉得，如果缺乏时间，藏书和藏画，尤其难以兼顾。正如藏书经常需要整理修钉，字画也经常要一点余暇来做些护修的工作。象我们这类庸庸碌碌、终日忙着找生活的俗人，一般上并不善于保护字画。那么，再名贵的艺术珍品，一到我们手头，恐怕也不免遭殃的。

这也可以说明，何以历代的许多有名的字画收藏家，大都是出于生而有闲的富户巨室。

（一九七七年九月）

旧诗三首

元夜题槟城友人书帖

武夫叱咤京华时，古庙有人抄汉碑。
底事金吾不禁夜，犹抛心力录唐诗？

一九七〇年·槟城

读冯伊湄遗著

何宋坚贞许氏贤，女中三杰自堪传。
江山又出才人妇，动魄惊心《夺命》篇。

《黄泛》苍凉胜《国殇》，万人落泪看《逃荒》。
人民艺术千秋在，不负颠连渡五洋。

一九七七年八月

答C君

卅载相思杳雁踪，非关病酒非疏慵。

绿衣祇派平安字，寸纸难描羁泊衷。

塞外秋寒困仲则，海隅春雨悲坡公。

馀生爱读六臣注，为记前贤篳路功。

一九七七年十月

附C君原作

迢遥远徙忆旧时，执册吟诗见丰仪。

三十年来鸿雁杳，几多世事沧桑移。

只惭疲驾悲花落，更羨长风凌斗箕。

不虑龙钟须发白，华章到手慰相思。

一九七七年

文艺活动纪略

观止

大概是年纪的关系吧，近年来渐渐有了“办结束”的思想，对于新的资料并不十分留意。这种情形，今年也不例外。所以一年来星马华文文艺的活动，我所了解的不会太多，这里所记的只限于书刊的出版、创作比赛、大马写作人协会的筹组，以及戏剧活动等三数事。

副刊、杂志、书本

报章副刊，大报方面的没有什么变化，中小型报方面却就有了些微波动：吉隆坡《建国日报》的《大汉山》和新加坡《新明日报》的《新风》都先后停刊。前者于去年底收档，后者于今年六月改为《大千》，全部采用剪稿。吉隆坡《大众晚报》今年二月有《大众文艺》的创刊，每周三期，每期半版。我所见到的是最初三两个月的一批剪报，包括一两篇书评，以及一些讨论《马华文坛何以难于顺利发展》的文章。那是一位热心的朋友寄给我的。后来情形如何，不得而知，最近听说也已于十一月初停办了。

定期杂志方面，情形也与报章副刊相仿。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刊物，如《新加坡文艺》、《新加坡青年》等，仍然

照旧出版，有的还在形式上作了革新。如《新加坡月刊》和《展望》，均由十六开本改为公制的A四型。《民众报》、《燎原报》、《南洋教育》、《挺进报》、《奋斗报》等，也先后由散页的小型报改为杂志型式。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文学月报》，也宣布由明年起改为半年刊（杂志）了。至于若干根基较浅的出版物，就显得很不稳定。《知识天地》、《吡叻月刊》，今年都先后停刊。特别是《知识天地》那么一个有份量的月刊的停止出版，一般上都觉得是读书界的一个损失。目前还可以维持下去的大约是三几种年刊或半年刊，如《北斗文艺》、《楼》、《度荒文艺》（后两种是今年创刊的）；或者是一两份以少年学生为对象的读物，如《大众知识》、《青年广场》。其中以《青年广场》较有文艺性。

单行本的文集的出版，则比综合性或文艺性的杂志平稳得多。不但原有的一些出版社都照常营业，新的出版机构也增加了三几个，如甘榜出版社、风华出版社、大地文化事业公司等。

就出版物的数量说，今年大约是七八十种，与去年差不多了多少。各个出版机构之间，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的产品最丰，洪炉、风云、高虹、而今等次之。世界书局和万里书局虽然出书不多，但如《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选集》等三几种，却是比较的巨著厚册，也不失为一个特色。又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郁达夫这两册遗著的出版，郁氏居留星马期间的作品，除了极少数的酬酢之作，大体上已经搜罗

齐全，可供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了。

下列诸书，有一小部份系录自报刊上的评介文章或出版消息，原书尚无法购得，所以书名或分类上可能有些错误。

小说——《黎明前夕》（岳典）、《还乡》（廖原）
《道路》（石剑洪）、《让回忆随风飘》（郭四海）、《残夜行》（苗秀）、《生命的行脚》（李建）、《约会》（李建）、《金色年华》（郑昭荣等）、《魔镜》（周燦）、《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特辑》（新加坡文化部编）、《永恒的爱》（星马港小说创作比赛选集，白金等）、《锺瑜小说集》（锺瑜）、《我要吃饭》（严若冰）《英雄梦》（吴登）、《亲情》（江飒）《当朝阳初升》（连铜）、《贝壳之歌》（梦平）、《潘友来小说集》（潘友来）、《焚之外》（雅波）、《热带风情画》（芸窗）、《为了爱，要恨》（韦西）、《吻壁老人》（黄晚香）《金兰姐妹》（田流）《冷暖人间》（志工）。

戏剧——《贺天相声集》（贺天）。

诗集——《近代马华诗歌选集》（李拾荒编）、《长槽集》（康静城）、《无色的虹》（柳北岸）、《湖、千里路》（曾泓）、《呕吐》（子凡）、《黎明底星山》（江鎭）、《桐窗内外》（孟沙）、《天掉水》（杰伦）、《赤道短歌吟》（冷笛、青山）、《开麦拉》（小凡）、《山雀的早晨》（端木虹）、《灵泉》（丘梅）、《紫一思诗选》（紫一思）《言筌集》（张尘因）《刻背》（何燦良）。

散文——《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林徐典编）、《郁达

夫选集》(张笏、方修合编)、《炉烟集》(方修)、《林涛声里》(黎力)、《南枝集》(王梅窗)、《芦苇集》(常追风)、《直面惨淡的人生》(罗燕萍遗著)、《有闲集》(林言)、《豆香处处》(石君)、《十三人散文》(黄继豪编)、《线内线外》(黄叔麟)、《风里的岁月》(冷若冰)、《游踪》(骆明)、《苦菜篇》(葛凡)、《路迢迢》(征埃)、《留法偶感》(横眉)、《狮岛的春天》(君绍)、《小径》(莎克)、《西窗晨语》(蓝玉)、《晓晴斋散记》(胡博渊遗著)、《都门小集》(梁良贯)、《两个后生》(子凡、采多)、《忘海的日子》(吴海凉)、《万里星天》(清疆)、《村夜缀拾》(清疆)、《星期六的世界》(蓉子)、《人生杂谈》(章明)、《散帚集》(英培安)、《生命的旅程》(仲临)、《东海岸路》(醉梦斋遗著)、《廿人行》(沙巴青年创作选集·归雁编)、《花开阳光好》(川草等)、《世界和平之路》(杨国柱、杨懿照)。

总集——《落叶的日子》(章钦)、《诗写在新加坡河》(叶苗)、《吟露小说散文集》(吟露)、《妇女作品专集》(锺文灵编)、《美丽的新加坡》(《中学生文丛》第三册)、《丹州长桥杂文稿》(董天成)、《斐楼文集》(匡光照)、《云深不知处》(黄大刚)、《榴槿花开的时候》(半岛)、《民族魂》(半岛等)。

史著、评论——《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方修)、《北方春草迟》(方北方)、《关于评价历史人物问

题》(景云编)、《本地画坛的剖析与创作路线的检讨》(横眉)、《美术论析》(翁翼)、《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钟夏田编)、《文艺随笔》(杜诚)、《鲁迅与马华新文艺》(章翰)。

其他有关读物——《砂朥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田农)、《风云人物》(郑辉)、《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郑文辉)、《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三册》(吴华)、《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吴华)、《人权影下观世局》(黄寒秋)、《誉、毁、卓别灵》(文君)、《木屋问题》(叶健编)、《简体字应用文论集》(谢世涯)、《世界发明史》(许云樵译)、《甲寅十届泰马诗人中秋雅集特辑》(南洲诗社)、《生活剧社成立六周年纪念特刊》(生活剧社)。

创作比赛与出版基金

举行创作比赛,设立出版基金,文学奖金等,今年似乎风气更盛,蔚为星马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下录是其中数项:

一、新加坡文化部主办“诗歌创作比赛”。一月初宣布,二月底截稿,共收到四种语文的诗作一千八百余篇,作者九百余名。优胜名单于七月底揭晓。华文源流公开组录取九名,学生组七名,得奖作品已在《星洲》、《南洋》两报文艺副刊发表。

二、新加坡文化部主办“剧本创作比赛”。八月间宣布,分为独幕剧及多幕剧两组。明年正月十九日截稿。

三、南大诗社主办“全国新诗创作比赛”。一月初征稿，四月十五日截稿。公开组及学生组各录取优胜奖三名，入选奖五名。颁奖礼于六月廿五日假星洲日报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由国会议员何家良主持。

四、新加坡职总喉舌《奋斗报》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暨工友征文比赛”。分为公开组及工友组，公开组录取首次二名及入选佳作五篇，工友组录取第一二三名及入选佳作七篇，十一月截稿，十二月揭晓。

五、星大中文学会“一九七七年度文艺创作比赛”。二月下旬开始征稿，分为公开组及学生组。八月卅一日截稿，共收到各种体裁的作品九百余篇。闻最近已完成评选工作，定一月初举行颁奖仪式。

六、联邦华校教总主催、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协办“全国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今年年初举行，优胜作品于四五月间先后在报端发表，反响良好。根据一般批评，认为各类入选佳作中，小说《摊位》以及剧本《猪瘟》、《一个少女的转变》等，均有相当水平；抒情散文和诗歌则比较贫弱，囿于身边琐事，内容空洞。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作者如果不把立足点移到生活中去，只一味低首苦吟，那么，其作品除了词藻华美及技巧较成熟之外，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一些迷失、自我编织颓梦的、游离生活的无聊赖的情绪”。论者也希望今后评选时，“应重视内容是否坚实这一个问题”；“技巧好而思想内容空洞的作品，对于发展健康的文艺创作，并无多大的帮助”。（陈焕之：《批评与建议》。五月

廿三日《文艺春秋》)

七、马来西亚福联会暨雪州福建会馆联合设立“文学出版基金”。七月底起开放予全马华族写作人公开申请，截至十月卅一日，总共收到四十七部著作。其中应征学术研究奖者四部，文艺创作奖者四十三部。（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翻译、及儿童文学七组。）主办当局目前正在审阅稿件，得奖名单最近可公布。

八、南马文艺研究会“青年文学奖”。第一届于三月十一日假麻坡举行颁奖礼。第二届于七月截稿，十一月揭晓，十二月十七日假新山颁奖，有七人入选。

九、北马天狼星诗社主办“大马现代诗奖”。八月十五日截稿，十二月廿九日揭晓。

大马写作人协会的筹组

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的筹组，也是本年星马文艺活动中受注目的一件事。据报载，三十余名写作人于六月杪在吉隆坡举行座谈会，讨论“应否筹组大马写作人协会”，即席成立十五人筹备委员会，负责草拟章程并订期召开全大马写作人大会。委员包括原上草、锺夏田、孟沙、慧适、金苗、碧澄、陈蝶、杰伦、陌上桑、子凡……………等。

筹委会复于七月下旬在麻坡、吡叻、檳城召开座谈，成立南马、吡叻、北马各区联络小组，协助筹备工作。

这个写作人协会的筹组，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吉隆坡《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显得最为积极，每星期都有三

几篇文章出现，各抒高见，大力支持。这些作者，有的呼吁大家求同存异，团结图存；有的责备文人相轻，门派林立；有的则建议如何劝捐筹款，出版书刊。这里摘录几段文字，以为代表。

温任平的《再谈写作人协会》——

“我们不必强求相同，一个有容纳性，有代表性的写作人协会应该能兼容并蓄，让文学的个别流派能互放异彩，相得益彰。……各种文学上的主义或流派，在‘拿出作品来’的良性竞争下，自然会发挥一种监察与监督的作用。……

“筹组写作人协会，如要有成果，必须‘能够不计较私人恩怨，不固执己意’（一介先生语）。杨升桥先生在五月八日的《读者文艺》中亦指出马华写作人‘分裂即灭亡’这个可怕的后果。……这些见解此时此地的写作人不妨再深一层地去想想，我们能够为了个人的恩怨，弄到分裂，以致生存能力瘫痪吗？我们都同在一条船上（马华文艺界），在船上互相倾轧、排挤，有一天，如果船沉了，谁是千秋万世的大罪人？”（五月廿一日·《读者文艺》）

胜水的《是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掀开本邦华裔文化历史，历年以来，马华的写作人、文化界，便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没有团结，慢慢地抛落在时代的后头，是多么可悲的事。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他们非仅自立门户，各自为政，互相轻视，甚至互相攻击，互相诋毁，是造成文坛不振，人材涣散的主因。……通过写作人协会，我们可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矫正文人

相轻的不正常的心理病态”。（六月十九日·《读者文艺》）

鍾夏田的《寄读者通讯》——

“说要组织一个写作人协会，已经说了十几二十年了，结果到现在，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徒然贻人笑柄。忝为文人的一页，也觉得不好意思。你所提到的，协会不能成功组织的一个原因，是文人相轻，这是真的……社会上，泼冷水的人到处都有。这些人平时什么都不干，但当有人在干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闪出来冷嘲热讽，讥三弹四，以为在做些什么好事来了。他们本性如此，最好一笑置之”。（六月·《读者文艺》）。

海凡的《团结起来，肩负时代的使命》——

“回顾马华文坛，去年的一场大笔战，确实掀起一股乌烟瘴气，热焰迫人；如今雨过天晴，与其四分五裂，各树一帜，互不来往，何不为了华教的存亡，以及马华文艺面临时代挑战的问题，而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八月·《读者文艺》）

《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方面，对于筹组写作人协会事宜，兴趣似乎不及《读者文艺》那么浓厚。该刊虽然也有若干文章参加讨论，但内容却着重在批评某些论调，包括“派别论”、“文人相轻论”等等。这里也同样摘录几段文字下来，以见一斑。

拍天浪的《夜读随笔》——

“那些自称要‘献身文坛’、发见文坛‘危机’，而非要筹组写作人协会，以求团结图存不可的人物中，有的是大

拍屈原的肩膀，硬派他是现代派的祖师，终于背着他的尸骸招摇过市，进而对马华文艺进行泼妇骂街；有的是一面诬蔑马华文艺，叫嚷什么‘不屑一顾’，进而拿出莎士比亚的灵牌去吓人，一面又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说是担忧文坛混乱而患上失眠症；有的却是是非不分，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凡有论争都有他的份儿，所用的战术却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将一切诋为一丘之貉。……这些人物一个个在亮相，大谈特谈。人们不禁要问：这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些论调归纳起来，不过下列三项。一、以为文艺界分门别派，造成不能团结。那么，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要待解决的是，衡量一个写作人是否配称为马华作者的标准。……即使用派别论者的观点来看，如果某‘派’某‘门’的作品符合上述的要求（指正确的创作实践），‘派别林立’也非是团结的障碍。譬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他们原来也不是同一派的，但是他们终于向大团结方面走去。

“二、以为凡有论争，都是派别之争，意气之争。这种论调，近来倒也十分流行；其目的在于为批评者捏造罪名，歪曲和缩小论争的意义。其实，批评所引起的论争，即使沦为派别或意气之争，其间也必有是非之分，是作者之间不同的文艺观的一种反映。……论争之所以混乱，在于有人趁哄而起，在其间大做生意。……”（六月二日·《文艺春秋》）

范调的《名不正，言难顺》——

“中国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还不是存在着各门各派

的文学形式么？那时期，是否有中国作家协会的组织？然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蓬勃，并不因没有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而停滞。马华文学的发展已有好几十年，这么久以来，并没有什么作家协会的组织，但马华文学还是一样的要发展，要生存”。（六月六日·《文艺春秋》）

伍仗言的《当前马华写作者的重要课题》——

“时下马华写作者协会的存在与否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马华写作者如何通过他们的笔端去反映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社会，把现实主义的傳統发扬光大”。（六月九日·《文艺春秋》）

贺雷的《发扬传统，认真创作》——

“筹组协会本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重视和考虑的事，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和适合的话。但综观所谈，我们发现有些写作者不但写得内容苍白空泛，而且片面偏激，甚至在胡扯中含血喷人。他们竟然无视于马华文艺发展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却别有居心地、蓄意曲解事实地把长期来协会之没有成立起来的事，一股脑儿归咎于所谓由于‘马华文坛派别林立，很难携手合作，而且还自相残杀、互相攻击’，有以致之。象这样似是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并非新鲜）的滥调重弹，究竟是在袒露其欲筹组协会的‘真心’呢，还是只不过想借题发挥，诬人清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假意’？”（七月十一日·《文艺春秋》）

此外，伍仗言还有一篇《筹组写作人协会的另一面》，批评一些谈论筹组写作人协会的文章，谈呀谈的，却始终

未见各造人等提出马华文艺的核心问题，马华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马华文艺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一味在一些小枝节上，个人的荣誉上兜圈子，不然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作者特别指出：“写作人协会并不是某个垂死挣扎门派的起死回生符，也不是个人沽名钓誉的捷径”。

《读者文艺》的一般作者对于这些批评，除了指为“泼冷水”之外，偶尔也有间接的驳复。如说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虽然没有作家协会的组织，但后期却就有个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淡雅：《协会拉杂谈》）。其实这还是各说各的，两者并没有什么冲突。一九三八年以后中国虽有全国性的作家协会的成立，但在这个协会成立以前的长时期间，中国新文学同样是蓬勃发展，这一点也仍然是事实。

这还是较早一段时候的情形。到了最近的一个阶段，《文春》和《读者》更是完全相安无事；代之而起的反而是吉隆坡《新生活报》和《大众文艺》（沙风编）的“热骂”。《读者文艺》似乎也有若干文字介入，予后者以声援。这一回，论争的问题虽然也是关于写作人协会的筹组，但已是另外一种性质。据悉，那是一些原先支持组织写作人协会的作家以至筹委之间的内讧。详细情况，因资料短缺，无法报导了。

戏剧、音乐、舞蹈

戏剧活动，今年似乎比较寥落。根据手头的不完整的资料，星马两地合计起来，纯粹的戏剧演出，只有下列六出：

《梁上君子》——新加坡艺术剧场。（九月廿八日至十月二日）

《江湖儿女》——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一月四日至九日）

《醍醐灌顶》——吉隆坡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六月）

《春风化雨》——同上

《萤》——同上

《钦差大臣》——同上

吉隆坡戏剧节是该地文教界今年的创举，由剧艺研究会、尊孔校友会、人镜慈善白话剧社、雪森彭锺灵校友会……等八大团体联合主办，于六月十一日起一连演出十二晚，甚获好评。但对于各地的戏剧艺术的刺激推动，一时还不易看出。

比较热闹的还是一些综合性的演出或纯粹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的活动。下表是个人所知的一部份，当然还有不少遗漏的。

新加坡方面：

迎春晚会——女皇镇图书馆。（二月十二日）

“欢乐歌声处处扬”音乐歌唱晚会——人民协会合唱团庆祝十周年。（三月十九、廿日）

民歌民乐到春天——文化部主办“大众音乐”。（三月十三日）

实验音乐舞蹈晚会——实验剧场。（四月一日至三日）

学习汇报演出（包括短剧《他们都是好孩子》）——实

践艺术学院。(六月四日至十二日)

民众文娱巡回演出第四十辑(包括歌舞剧《归来》)——人协文工团。(七月廿二日)

文娱晚会(包括琼语话剧《打破镜子的女人》)——新加坡琼州青年会。(十月十八日至廿一日)

“生活旋律”音乐晚会——星市音乐会。(十二月五日)

群舞争辉舞蹈联会(包括舞剧《今日的新加坡》)——凤凰舞蹈团庆祝成立六周年。(十二月九日——十一日)

联邦方面:

文娱艺术晚会——昔加末圣约翰救伤队分团主办。(三月廿七日)

文娱晚会(包括闹剧《今事古谈》)——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华乐队主办。(四月十六、十七、廿三日)

华乐之夜——芙蓉真光道堂主办,巴生港口新韵音乐社华乐团演出。(四月)

吉隆坡歌乐晚会——州立学校家教协会演出(七月十六、十七日)

歌乐文娱晚会——瓜拉丁加奴潮洲会馆青年组主办。(七月卅日)

校庆联欢晚会(包括话剧《学成归去》)——马六甲培风中学。(八月廿、廿一日)

文娱晚会(包括话剧《土地土地》、《原谅我》、《人望高处》)——巴生兴华中学。(八月)

会庆文娱晚会——巴生福建会馆七十三周年纪念。(八

月)

槟城合唱大比赛——槟城音乐协会主办。(九月三日)

汇报演出(包括朗诵剧《这样的下一代》)——太平艺声音乐社。(九月)

音乐舞蹈晚会——雪兰莪琼青文艺团。(十月廿九、卅日)。

文艺晚会——吉隆坡琼联剧社合唱团。(十一月廿六日、廿七日)。

琼联剧社合唱团的演出最为轰动,报章上佳评如潮,好些节目如《黄梨园组歌》、《胶树》(大合唱)、《海燕颂》(朗诵舞蹈造型)、《阿华和汤米》(快板)等,都受到一般论者的赞赏。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最早出现的马华新文学作品 ——文学性时评

(一)

在初版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开篇，笔者曾指出一九二〇年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开端，也即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当时因为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并不全面，所以特别参考了一些间接的史料，以助判断。最近新得到一次早期的《新国民日报》，并抽出了三篇时评，以作较为详细的研究。结果，觉得一九二〇年这个期限的确还符合事实。但如果求其严格一点，则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可以上推前几个月，定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因为，最低限度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一版《新国民日报》创刊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具有新内容的白话文学作品随之出现了。

不过，这些最早期的马华新文学作品，其出现的情况是比较隐晦的。它们绝大部分并非诗赋、小说、戏剧等创作，而是一些文学性的时评、杂感、以及记叙散文等等；而且主要的并非发表在报章的副刊版，而是散见于新闻版的“时评”、“要闻”、“杂俎”各栏。副刊登载的只是一个小部份。这是马华新文学萌芽初期的特点。一直到一九二〇年，由于文艺创作在副刊版推出之后，情况才渐渐的改变。

最早出现的马华新文学作品 ——文学性时评

(一)

在初版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开篇，笔者曾指出一九二〇年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开端，也即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当时因为所掌握的原始资料不够全面，所以特别参考了一些间接的史料，以助判断。最近笔者重新翻阅一次早期的《新国民日报》，并且拍摄了几百张照片，以作较为详细的研究。结果，觉得一九二〇年这个断限虽然倒还符合事实，但如果求其严密一点，则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可以更推前几个月，定为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开始。因为，最低限度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新国民日报》发刊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具有新内容的白话文学作品随之出现了。

不过，这些最早期的马华新文学作品，其出现的情况是比较隐晦的。它们绝大部分并非诗歌、小说、戏剧等创作，而是一些文学性的时评、杂感、以及记叙散文等等；而且主要的并非发表在报章的副刊版，而是散见于新闻版的《时评》、《要闻》、《来件》各栏。副刊登载的只是一小部份。这是马华新文学萌芽初期的特点。一直到一九二〇年，若干文艺创作在副刊版推出之后，情形才渐渐的改变。

这原因，可以分为三点来说。

一、马华新文学萌芽初期，写作人少，新文学的创作经验的吸收与积累也很鲜浅，所以一般上乃止于评论、杂感、散文随笔等“杂文学”的写作；至于诗歌、小说、戏剧等“纯文学”创作，一时还少去尝试。这种现象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的发展，诸如先有《尚书》里面的若干散文，然后有诗三百篇，再后才有小说戏剧的出现等情形，颇为相似。

二、当时投稿的风气尚未开扬，报章的副刊还以剪稿为主；而新闻版则由于各栏文字大都是报馆的特稿，其地位在编者读者的心目中均较副刊版为高。所以凡有重要的文学性作品，出于报馆人员之手的，固然是当作业务上的撰述，照例在新闻版上登载；即使是外间投稿的，也尽量拿来当作《要闻》或《时评》刊出，或者特辟《来件》栏加以容纳，以示对于这些稿件的重视，并促使读者注意；虽然这些稿件如果编到副刊版去是会更为适当的。此外，也可能因为报章的新闻版当时经常有稿荒现象，需要多用些外稿去充实篇幅，以致分配到副刊版去的文章为数不多，内容也比较次要。

三、一九二〇年以后，当地的诗歌、小说、戏剧等创作渐次出现。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和评论、杂感、散文随笔等相差太远，既非《时评》栏所能容纳，也不能当作“要闻”或“来件”刊出，势非集中到副刊版去不可。于是副刊的剪稿逐渐减少，地位逐渐提高，不但成为当地的“纯文学”创作的发表园地，连许多重要的“杂文学”作品，也开始从新闻

版移到这里来了。不过《时评》、《要闻》、《来件》各栏的登载“杂文学”作品，基本上还维持到一九二二年。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情况，有其初期与后期两个阶段的不同，各种文学样式的出现，也有先后之别。初期只有杂文学作品，极少纯文学创作；而且新闻版的地位比较副刊版更重要。到了稍后阶段，各种文学体制才臻齐备，而且汇集到副刊版来。因此，我们谈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作品，首先就得说到评论、杂感、散文随笔这些杂文学，而且得把视线放到副刊以外的一些版位去。

这里，先就现存的《新国民日报》的资料，来看看早期的一批文学性的“时评”。

(二)

文学性的时评（或称政论散文），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期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之一，在产量上也很丰富。它们主要是发表在报章的新闻版的《时评》栏上。就当时《新国民日报》的情形说，这一栏是分设在《本坡要闻》、《南洋要闻》、以及《祖国要闻》各版的右上角或左下角。每天推出短文数篇，多以白话写作，每篇由一二百字至五六百字不等，更长些的就编入《社论》栏。经常执笔的有苦、超（一署超顽？）、我（一署亦我？）、鸠（或署痴鸠，即该报主编张叔耐）、警公、何畅秀、田舍郎、虎（一署老虎，姓黄，为该报副刊编辑之一）、芳、永仁、鉴民……等等，这是马华新文学最早期的一批作者。其中约有一半是报馆编辑部人

员，另一半为外间的投稿人。后者的稿件经常在署名的下面附有“稿”、“投稿”、或“来稿”字样，如“田舍郎稿”、“警公投稿”、“永仁来稿”之类。

这些称为“时评”的作品，如果只是顾名思义，不看内容，人们大概会以为那都是一些严气正性的中外时事或地方新闻的述评，实际上大大不然，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固然是新闻性或逻辑性多于文学性，只能视为普通的时事评论，不需列入文学范畴；但大部份却是写得流利清畅，韵味深永，很有美学价值，是马华新文学的矿藏的第一批财富。下面一篇抨击庆祝孔子诞的作品，可以代表它们的一般水平。

书 所 见

亦我

昨天大街小巷，莫不悬着五色国旗，大小商家并皆关门休业。余弄得莫名其妙，以为今日必定是吾国什么大庆的日子，莫非我不留意，忘却了这纪念日不成？遂三脚两步的跑到自家里，寻着一本《法令汇编》，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究竟这天是个什么日子。无奈翻来翻去，总没有见吾国以法令公布，定今天为大庆的日子。满脑闷葫芦，正在没有解决方法的时候，刚有一位我的知友气呵呵的跑到我前面来，连声叫道：“亦我，亦我，你为何无精打彩的一个人坐在这里，你竟忘却今天是孔子的生日么？”我听他这一句话，才如梦中醒转来，知道今天悬旗休业的原因，原来是

庆祝孔子的。(一九一九·十·廿一)

作者由侧面着墨，淡淡几笔，突出了当时流行的“打倒孔家店”的思想主题，同时也富于抒情的气氛。

(三)

《时评》栏中另有一类作品，虽然称为时评，其实和时事时局或地方新闻竟然毫无关联。它们只是在谈论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或人生哲理，和后来见于报章副刊的一般散文随笔，性质完全相同；兹录其中一则于下——

古语说得好：“人为万物之灵”。但是拿这个来看现在社会的人心，灵字是好久寻不着的。这些原因，皆由不明白做人的方法吧了。咳，什么叫做人呢？待在下说来给诸君听听。

一、不能脱除那不正当嗜好不是人；二、不能排除那文明障碍物不是人；三、不能独立谋生不是人；四、不能爱护同类不是人；五、不能尽人类的责任不是人。

右述五件事，倘能这样勉力去做，就是人了。如若不然，就不独不是人，还是人类的蠹虫呢！（苦：《什么叫做人呢》。一九一九年十月卅日《新国民日报》）

这一类“时评”，没有时间性，新闻性，十足是一种文学性论文。它们在马华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诸子散文是大致相近的。

(四)

同样在《时评》栏占着相当的篇幅的，还有一类文章，谈论的对象是一些文学问题或文化问题。它们的文学性高低不一，思想也未必很正确，但对于当地的新文学活动，却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因而也应该列入马华新文学的范畴来；这里也录出一篇为例——

某报前天曾刊了一篇恒升投稿《千夫所指之陈独秀》的时评。他底时评里有几句道：陈独秀之提倡新文化主义，即如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等等，国内一般青年志士皆鸣鼓以攻之。……噫，陈独秀乎，何汝冥顽不灵，一至于斯耶？汝之不见容于社会之中，实因汝之主张，与禽兽无别也。汝之罪大恶极，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语曰：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其陈独秀之谓乎？

哎哟，恒升呀！你既然说他是提倡新文化的人了，为什么也相信这种不近情理的谣言而来骂他？其实陈君何尝说过这些话。他的著作，刊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不是大家都曾看见过的吗？他的演讲，不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处的人都曾听见过吗？试

问那一个曾看见他底著作，或曾听见他底演讲，有说过这些话的？

唉！这明明是一般反对的人所捏造的谣言，也许是一个最容易明白的道理呀。不料恒升也要借这个好题目，来骂一个含冤莫白的陈独秀君，这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至于你骂他为冥顽不灵呀，与禽兽无别呀，罪大恶极呀，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呀，这些话我觉得太恶浊。我劝你以后象这种借题骂人的话减出口些才好！（厚禄：《忠告恒升》。一九二一年八月廿日《新国民日报》）

（五）

《时评》栏中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是上述三类。这样的一种专栏的创辟，并不是一两家日报所特有，而是当时一般华文报章的普遍现象。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各地的报章以及星加坡的《叻报》，吉隆坡的《益群报》，檳城的《光华日报》等等，每天都各有三几则“时评”发表，取稿的情况也和《新国民日报》大致相同。《新国民日报》偶尔也转载其他各报的时评作品；其中有若干篇原为杨铨、叶楚沧等中国政界闻人的手笔，均直接标出作者的大名，餘者概无署名，只注明其出处，如写着“录《香江晨报》”、“录《菲岛时报》”、“转录《苏门答腊日报》”、“转录《益群报》”等等。

从这些转载的文章看来，当时南洋各地报章的时评作

品，一般上都有很高的文学性，其写作技巧与思想水平，比起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来，常常是有过而无不及。下录檳城《光华日报》的一篇《都是至死不变》，可以略见一斑：

我想一想，革命党和保皇党的人，都是天造地设的。革命党的人大抵在娘胎里时，便感受革命的思想；故此出世后，就是一个革命党。保皇党的人，又都如是，在胎里也受恩深重；出世后，就是一个保皇党。

有人问，有甚凭据呢？我说，两种人都是至死不变的，岂不是凭据么？革命党的人，明知牺牲，偏要替大众谋永远幸福。唯是，自己先要拼死去争，○○○（原文）也不顾。争得幸福，或者自己不能享的，也要去做。更有做了一次，又一次，三次，四次的。这就是至死不变了。

保皇党的人又怎样呢？初时说保光绪，怎料自己都不能保，被那拉氏通缉。他跑到海外，来保国内的皇帝，明知做不来的，他依然说保皇。如今中国是民主国了，断没有皇帝再出现的道理，他又说保皇。保皇的人，又是至死不变了。”（《新国民日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转载）

（六）

一九二二年间，当地的诗歌小说创作，已有相当的成

绩，时评作品的文学成份，因之也有进一步的提高。有些“时评”更完全写成了纯文艺创作。例如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的一篇《悼伍总长》（指伍廷芳），实际上就是一首新诗——

伍总长，你为什么死？

你为着国家的重任，时时刻刻都要想出救国家的法子来。

那知经了许多的挫折，还没有偿你素愿。

唉！志在救国家，而国家竟不为你救，你怎能不死？

伍总长，你为国而死！

国家前途茫茫，还达不到救国的目的。

你抱了正大的宗旨，高尚的人格，还是鬱鬱不遂志。

唉，你的身体虽死，你的灵魂不死！（陈辉农稿）

一九二三年起，《新国民日报》的《时评》栏，易名《评论》，取稿范围更加扩大，增加了许多文学及戏剧的理论文字。然而由于副刊版的内容逐渐充实，这一栏的地位反而没有最早期那么重要了。

（一九六五年稿）

马华杂文的初期形式

(一)

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另一批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是一种侧重谈论个人的感触的短文——杂感散文，当时一般上叫做“随感录”（或称“杂感”、“杂感文”），也就是后来盛行于文坛的杂文的初期形态。这种文体，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间就已开始发展，它们和那种文学性的时评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格一样老，产量也同样丰富。它们的发祥地包括报章的《要闻》栏、《来件》栏，和副刊版。就中以散见于《要闻》栏，被当作新闻稿登出者为最早的发表形式。

就《新国民日报》的情况说，杂感散文最初经常被编入《本坡要闻》和《南洋要闻》两栏中，有时也被移到《时评》栏去，以致时评作品也参有一些杂感性质的文章。例如上面谈“文学性时评”一文所引录的一篇《书所见》，抒写孔诞的感想多于发表批评，实质上倒是一则“随感录”。不过这种情形是比较特殊的，一般说来，“时评”和“随感录”之间还是约略有其分界线：前者态度比较端庄凝重，多属正面的评论；后者运笔比较自由放逸，时有讽刺的语调。

当时在《新国民日报》的《要闻》栏上撰写杂感的，一

小部份是该报的记者，绝大多数为外间的投稿人，后者的文章照例在篇首冠以笔名及“稿”或“投稿”字样。其中有一笔笔名“朽木”的，作品特多，而且经常被编排为“头条新闻”，显然很受重视。下录一则，就是在这样重要的版位上出现的——

不好的国民

（朽木投稿）读《新国民日报》十月九日《时评》，有讲“好国民”，中分出两个题：好国民与不好的国民。吾于十日，就把这两题，到处看看，有几多的好国民。那日所见的好国民很多，不好的国民少。不好的国民在甚么地方多呢？就是小坡大马路某属人所做的某种商店，有六七间，没有一间休业起来庆祝国庆。其中有某号某君，前被举为某某社长，民国六年，某甲运动选举时，某君博得议员头衔。国庆日，某君的店，也是照常开市，没有一点庆祝，这就是不好的国民了。（载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三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散见于报章的《要闻》栏的杂感散文，体制多种多样，各擅胜场，有的开门见山，针对某一问题直抒所感，近似当时的一些“时评”；例如朽木的另一篇作品：《好校长和不好的校长》——

（朽木稿）怎么叫做好校长和不好的校长呢？讲起来五

花八门。简单说，好校长，有知识，尽义务，教学生做人，学生在校中所得的成绩，分数，品行，必定一一记录。到了一学期，必将学生的成绩，分数，品行，书于纸上，交予学生家长看看。

他的思想是想与学生家庭互相联络，想教学生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好的校长呢？是没知识，没尽义务，教学生做器械，关于学生在校中所得成绩，分数，品行，没有记录。有者受了八学期的香火，也不识将学生的成绩，分数，品行，书于纸上，交予学生家庭看看。他的思想是想行专制，想与学生家庭隔离关系，将来俾学生为奴仆、为器械。这个是吾的鉴别好校长和不好校长法儿呢。（一九一九年十月卅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有的则叙事的成份比较浓厚，很有点散文美；往往是先写一段见闻，然后引发一番感想或慨叹。这一类作品占了当时杂感散文的最大多数，前引的《不好的国民》，即属于这一写法。这里再转录两则于下——

是否同类相残

我们有少数劳动界同胞，因为没有尝过教育的滋味，以致知识毫无，常有自相残害的事，这真是可怜呀！今早九点馀钟，余行经吊桥头勿基，见有许多劳动苦工，围在那儿喧哗，不知为着什么事。听说是有两三个苦工因事打架，有的人就去排解，有的人去围看，所以就这样喧哗。唉！我听了

这话，真感可哀得很，不觉叫一大声：教育呀，你可去照照他们呵！（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七夕是什么呢？

（潘子淳稿）前晚课馀，九点馀钟的时候，同两个朋友，去街上游游。见了许多红绿女人，手拿许多奇怪的品物，当空礼拜。询之同行，始知是什么牛郎织女两相会之期，有七夕这个名词。然在此数年来，各种迷信的事，似见略为改革，社会上也略见光明，为什么今日还听到这个名词呢？唉！同胞呵，那些捕风捉影及迷信的事情，现在应该改革呵！（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此外还有一种写法，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夹叙夹议，纵意而谈。例如下录一篇抨击腊味商人的文字——

杂货店前腊味油

（公亚稿）哈哈，杂货店卖腊味，真是奇怪了。平日的腊味，是挂在店内来待人客光顾的，怎么一到废历的尾月，就将各腊味悬挂门首骑楼底呢？并且油淋淋漓下来，真令我们过路人的衣帽都被染污不少了。哈哈，莫不是到废历年底时，他不将这些腊味挂在店门外，就会没人来买么？不然，怎么那般杂货店不顾公德商德到这样呵！我今天往牛车水，

经过某杂货店门首，被腊味油滴下，致染污了白衣帽，当时想骂他几句，回想这辈人一定是置诸不理的，故此我忍声吞气返回家里，来拿枝笔写在纸上，俾我侨阅了这篇文，会提防那腊味油呢。（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杂感作品散见于报章的《要闻》栏的现象，延至一九二二年，副刊稿与新闻稿有了较严格的区分之后，才算渐渐的少见。

（二）

当时杂感散文的另一根据地，是报章新闻版的《来件》栏。这种《来件》栏，相当于目前各报的服务版的《读者之声》；但刊期比较频密，经常每星期出现三五次，每次推出文章二三篇，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型的副刊。其内容比起目前常见的《读者之声》来，也较为繁富；除了一些呼吁倡议之外，还有一批演讲词、风俗谈、游记、剧评、教育论文、政治或学术问题的争辩、座谈会的记录、以及大量的讽世贬俗，鼓吹新思潮的篇章。最后的这一类作品，正是早期的典型的杂感散文——

告我们的好女子

唉！我们的好女子呵！来，一二三，小子有一句良好的话儿告诉你们，我很望你们留心留心听吧。什么事情呢？我

想你们个个都很喜欢去听戏的。听戏原来是很有益的，若然看着一出好戏，我们的知识也增广些。若然看着出淫戏呢？不特有坏我们，对于社会一层，更不必说了。我们应该不要去听。△△△的△△（原文）在某戏院登台以来所做的剧本，通通是有坏我们的，△字也不容讲了。但见我们一班好女子，不晓得什么东西，个个都好去听他。唉，我们的好女子呵！从今以后，去看戏要谨慎些，免被社会里有见识的见笑。这才可以叫做我们的好女子呢。（桂芬稿。载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新国民日报·来件》栏）

报章的《来件》栏登载杂感散文，为期较《要闻》栏长久。基本上要到一九二三年初以后，这情况才有改变。

（三）

副刊版发表杂感作品，始于一九二〇年以后，在时间上比新闻版稍为迟些，但情况最正常，最稳定；不特历时悠久，而且不断发展，成为了马华文艺副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一九一九年十月《新国民日报》发刊之初，虽然副刊《新国民杂志》设有《杂文》栏，但所登的尚非杂文，而是一些篇幅较长的时评或论文，如楚材的《男女交际问题》、晓虹的《教育革命论》等。一九二〇年以后，这一栏正名为《评论》（有时则改为《讨论》），另辟《舆论》与《杂录》两栏。这两栏名称有点奇特，所容纳倒常常是一般的杂文。当时该报与《叻报》之间曾发生一场剧烈的论战，有很多杂

文就登在这两栏里面。一九二二年一月间，《新国民杂志》副刊开始出现名实相副的杂文专栏，叫做《随感录》。许多重要的杂文作品，包括原先编入新闻版去的杂感随笔，都归到这一个专栏来了。

《随感录》是一个专栏的名称，同时也被作为杂文作品的总题。登在这一栏内的文章，始终是没有另外标题的，兹转录两则于下——

随感录

怪

新年恭维话，有一句最惹人讨厌的话，就是什么“从心所欲”四字。这四字虽然讨厌得很，但是心思各有各的不同，因此“欲”念也有各别。比方有文豪瘾的，就自然天天欲作文豪来出出风头了。有金钱瘾的，就自然天天欲金钱多些到手了。那么，我心里的“欲”毕竟怎样，待我说下去。

我欲世俗所说的甚么瘟神，忽然活现起来，尽把那般害群蝥贼，重的收了他拨入畜生道，轻的转了他的心肠勉为善人。

我欲古书里所说的甚么自由神，忽然活现起来，尽指挥那般贫困颠连的，从快活的路走去。

我欲从今年起，我民遵守阳历的一年多过一年。

我更欲我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人见着：那喜用阴历的，就会立刻遵用阳历；那贫困颠连的，不用自由神指挥，自己就会寻快活路走去；那害群蝥贼的，不用瘟神“收”和“转”，都能自己觉悟，勉为善人。哦！这就是我的“从心

所欲”。（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新国民杂志》）

随感录

乐仙稿

前几天我行在路上，口渴起来，就到那霜水摊，一连吃了霜水三四杯。当时吃得很爽快，谁料那晚回来，肚子里猛然发生战争。痛呵，痛呵！后来亏得我东主请了一位医生，该医生很知道我的病症，给我普救丸二粒吃下，我的病就好了。医生对我说，你的病症虽然好了，你的身体实在衰弱，以后对于此等食物，应该谨慎些才好。

因此我想到几年来的中国，受一般卖国贼捣乱，弄到象我的病体一样，后来亏得孙先生本他爱国的心思，设计医治，把一个危在旦夕的国家，忽然救转回来。唉，孙先生真可算是医国救民的大国手了。但是现在国病虽然渐渐好了，国势还是衰弱。我很希望我久病获愈的国民呵，快起来随着孙先生向光明路上去努力吧。（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新国民杂志》）

（四）

与《随感录》差不多同时在《新国民杂志》出现而名目相仿的专栏，有《杂著》与《杂俎》。这两栏表面看起来好象也是杂感散文园地，其实不然。前者主要是登一些研究性质的长文，诸如林独步的《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子淳的《星期日应该休息同不应该休息的谈话》等。后者侧重在世界趣闻的摘录与科学新知的介绍，

如《一百六十三岁之老翁》、《具有特殊德力之奇女子》、《梅花第一次运往英伦》、《影戏中之仙境》、《电气时代之电气世界》、《蒙古发见世界最巨之化石》等等。然而由于名目与杂文相似，这两栏有时倒也参入了一些杂感作品；这里各举一例于下——

说 生 蜉蝣客稿

“生”这个字，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很大，现在我拿几种事实来证明。花木当从地下发起芽叶的时候，那就叫做生机，青嫩嫩的一种乐生气和发育力非常充足。这是表明能找着生的路径，前途就能够发展。还有一事，更可以看得明显的。就是好象一个人站在那极危险的地方，四围都是豺狼和荆棘，一步一步地迫近他的身边来，正在不得免于死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一条生路，藉这条生路就可以逃出，这个危险的身子，不致受伤或殒命。照这样看起来，生的功用岂不是很伟大吗？但是世人往往把生死的路径认不十分清楚，就蒙然进行去，结果弄到终身陷在悲苦的环境里，一点儿舒展都不能。这岂不是很可怕的事体吗？所以我们青年人，就应该认清楚生死的路径，然后跟着生的路线走去，不要失足陷在死的环境里。青年呵，注意呀！（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一日《新国民杂志·杂著》栏）

上引一文，就是登在《杂著》栏内的，体制及实质，均与当时的一般“随感录”无异。下录的一篇《人类的死日在

这一星期内？》（一鸣稿），则是《杂俎》栏中的作品：

近日本埠人士，都大惊小怪地，盛传世界人类末日就在本废历十五以后十日内，要大地震、大海啸、大雷电、飓风、五日五夜不见太阳……种种见神见鬼的话。报纸上也载着：观察天文的唐先生，和北京宗教大会的郑先生考验实证……。

这种话哄谣起来传播，海内外人士惊惶失措；盛贮牛奶各种食料，真个手忙脚乱，心惊胆危，防险得真可怜。迷信的拜得偶像几乎立起脚来。金纸铺、香烛铺、牛奶铺，也几乎发了大财。

这个时候，倒是我们两只空拳的劳工者，领得无忧无虑的快活呵。

有钱的，就在山顶筑起草棚，预备地震时好躲避。哎哟，真笨呵！难道地震只震着埠中，山顶就不敢震鸣？果然如此，地球老爷未免太不公平了。果真会避过地震，那么大雹大风可也避得免吗？

至于地球，月球，在一块儿旋绕，若日球被地球遮住门面，也不过几分钟的日蚀，那里会五日五夜的不光呢？或者它们三个一块儿跑喘了，大家通告起来息息喘，所以打一门无线电给北京宗教大会郑先生知道，教他做代表来向我们人类请声假也未可知；但为什么别国倒没有通告，单只是通告中国人呢？或者它们只爱护中国人吗？不然，就都是一派捏造，一味邪说，一味藉端赚迷信家的钱吧了。

现在科学昌明，也还有这种稻中莠的宗教家骚扰我人类

的生活，好不可恨呵！列位如果看破世情，明白金钱是生不带来，死也没有携去，那末平素对于公益诸善事业出些力，也就可包管大家没有丝毫的危险的。（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新国民杂志·杂俎》栏）

总括来说，早期杂感作品的发表园地有三，即报章的《要闻》栏、《来信》栏、及副刊版。其中副刊版登载杂文，开始稍迟，但历时最久，一直维持到今天，成为本地华文报章的一个特色。单就《新国民杂志》副刊而言，则杂感散文最先是列入《舆论》及《杂录》栏，稍后始辟《随感录》专栏来容纳。同一时候出现的《杂著》及《杂俎》二栏，虽然分别作为专题研究及趣味文摘的园地，却也常常参有杂文作品在内。

（一九六五年稿）

马华记叙散文的初期形式

(一)

这里所说的记叙散文，是指一些从形象思维出发，侧重于描写个人的感情、心理、愿望、见闻之类的文学散文，包括记游、叙事、抒情等等作品。其他如历史传记、科学说明文、以及政治经济学术论文，都不在这范围之内。至于一些具有美学价值的时评以及偏重在抒发作者的感触的杂文（随感录），虽然也是文学散文，则因已有专篇论述，这里不再涉及。

马华新文学中的记叙散文，诞生的年份也很早，特别是叙事性质的作品，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出现，与当时的其他两种文学样式——“时评”和杂文，并为最早期的马华新文苑的岁寒三友。诗歌、小说、以及戏剧文学的兴起，都在其后。

叙事作品初期也和一般杂文一样，散见于报章的《要闻》栏，被当作新闻稿登出。但内容比较简略，形式不大完整，大抵是一段速写或素描之类。这些作品的篇首，也同样冠以笔名及“稿”、“投稿”字样，说明那是当时一般作者和读者寄来，为编辑先生们所推重，特别编入新闻版去的。

其实它们都是一些副刊稿件，并非什么要闻。例如下录一则，简直等于一幅速写画——

真是野蛮了

（公平稿）昨天下午五时许，余途经大马路△发兴△货店门首，忽闻恶骂声和喝打声，惊震耳鼓。急行近观察究为何事。见有一人某甲，被该店伴三四人围困，恶言谩骂，举起拳头，声势汹汹，大有不共戴天之仇般。那时某甲雍容大度，不和他计较。但旁观的见了这样情形，咸大抱不平。向该店伴大骂道：“你们做生意这样野蛮，真是岂有此理了。须知卖不卖是你的权，买不买是客的权，那有强人买这面盆的道理么？况这个面盆，邻铺不过取价银一元的，因何你取价银一元八角的多呢？他还价多少，乃平常事。怎么你们硬要强人家买，并且想殴打人家呢？”旁观的骂了一顿后，更高声大叫道：“野蛮！野蛮！”才渐渐散去。噫！该店伴的这样行为，真是野蛮成性，无商德到极了。无怪旁观的咸抱不平，大骂他们一顿。更幸喜某甲宽量大度，不然定有殴案发生了。（载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

作者相当形象地刻划出一幕街头杂景；其中商店恶夥的欺凌顾客，路见不平者的仗义直言，都显得颇为生动。

(二)

由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初，马华记叙散文中的叙事作品，多属上列一类速写素描文字。一九二二年二三月起，开始有了若干抒情性质的作品出现。但仍然被编入报章的《要闻》栏，和新闻稿混在一起。下录《哭友人苏君克仪的死》（杨觉非稿），即为其中的一篇——

……克仪君是琼侨的青年夜学生，也是个觉悟的△△者。因为受过新思想的洗礼，所以具有国家思想和社会观念，愤恨祖国政治的腐败和现在社会制度的不良，常常把革新政治，改造社会的担子，放在自己肩上。我和克仪君初次谈话的时候，他说：现在的国家，衰弱到极点了；现在的政治，腐败到极点了。这种图强和改造的责任，是什么人负担的呢？岂不是我辈青年负担的吗？所以我们青年应该养成奋斗的精神，△△的决心，更应该求殷实的学问和新鲜的思想，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哩！

唉！克仪君，你的志愿越高，你求智识的欲望越炽；你的境遇越苦，你改良社会的决心越坚。因你求智识的欲望越炽，所以用功越勤；因你改良社会的心越坚，你的奋斗越猛，你的病根就伏在这里了。

唉！克仪君呀，你因为敌不过恶劣环境的压逼而发生忧虑，你因为用功过苦而致身体孱弱。△病是宣布人家死刑的告示，竟来和你为缘了。你竟牺牲你的生命，作奋斗的代价了。你所抱的壮志，竟成为泡影了。我们觉悟的同志，又减

少一位了。我记得二个月以前你初得病的时候，我曾安慰你说：克兄，有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的。你这种病是很危险的，你要安心休养，不可急躁才好。那里知道我的话还仿佛在我的脑海，而你已经化为“异物”了。我想要哭你，实在没有眼泪可挥哩。

但是，你的躯体，虽然脱离了这龌龊的世界而去，你的奋斗精神，实永远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你名为死而实不死，你已可以自慰了。并且世间和你同一境遇的青年正很多呢！我现在为一个死了的你哭，竟不得不为一般和你同一境遇的生者悲了。唉！我说到这里，既哭死而悲生，我不忍再说下去了。克仪君呀，永别吧！”（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 至十一日《新国民日报·本坡要闻》栏）

一九二三年以后，由于纯文学创作多量出现，文学作品和新闻稿件的界限比较明显，因而不论是叙事作品还是抒情作品，都渐渐和新闻版脱离关系，汇集到副刊版去，和诗歌小说等等争妍斗艳了。

（三）

记叙散文汇集到报章的副刊版去之后，一般说来，发表的情况仍是相当紊乱的。特别是《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更加的显得杂乱无章。该刊对于诗歌、小说、戏剧、甚至于散文诗等类作品，都分别设立专栏来容纳，唯独对于文学散文，却不老实地来一个“散文”栏，而是

给它另立诸多名目，如《浪漫谈》、《谈话》、《漫语》、《通讯》、《笔记》等等。《通讯》栏专登一些书信体的文章，《笔记》栏刊载一些旅游见闻，以及笔记小说，民间故事等等，还算是比较正常的；至于《浪漫谈》、《谈话》、《漫语》各栏，却就不知道是表示什么，而且取稿也漫无标准。里面固然都有些文学散文，但也容纳科学论文以及有关青年修养的指导文字。似乎凡是格调比较轻松的文章，不管什么性质，都兼收并蓄；因而看来十分芜杂。这一点显示了当时的一般报刊的编者，对于文学散文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然而，这只是就当时的散文作品发表的情况而言，至于散文作品本身，形式上倒是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发展。叙事作品方面，作者们很快就越过了素描速写的阶段，创作出一批篇幅较长，内容较有故事性的作品，对于各种生活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比较地深刻细致，例如下录的苏正义的《在 Manila Show》——

他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极 *Ostentatious*，常常有理想，常常有他自己的对待朋友的态度。你可常常在影戏院里看见他跟在几个妇女的后面跑着。他是个这样的人，但他却喜欢说：“如果男子爱一个女子，一定要爱到底”。

我某一星期四晚，又在 Manila Show 遇着他。我正在那边奇想，这个 Show 真是个好不过的消遣的地方。那些一对一对的人，三五成群，满面都现着笑容。男子尽他们的

能事去装饰，在那 Show 里面 Show；女子脸上满满涂着粉，头上满满涂着油，画的眉黑，涂的唇红，也在那 Show 里面 Show。Show 里面 Show 着东一堆人，五光十色，西一堆人，天花乱坠，……仿佛一阵阵的蚁围着糖。我看见他，看见他和两个女子，不会再想下去了。

他今晚的脸，有点怒色，我奇异他何以如此。那两位女子，一个和他一样 *Ostentatious*，一个和他相反。这个 *Ostentatious* 女子是从 P 坡来的，是他的“如果男子爱一个女子，一定要爱到底”的女子。

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的理想了。他说：“我在 Manila Show 遇着伊，我实在十分恼怒。我昨晚不过是头一次去那边。好的女子那里可以去那边？女子实在不能相信。况且伊去那边又不先和我说。朋友，这些女子那里可以给伊太多自由呢？我现在要来禁止伊了”。他的朋友是个滑稽的人，便应他说：“如果伊从前不那样自由，你从那里去和伊相识呢？如果你说女子不可以去那边，伊不先告诉你，我不是个道学者，我要问你，你何以自己也要去那 Show？”他没有话了。

他们已经订婚约了。可是他的心还在那里疑着。他私欲心很重，他想要施行种种手段去束缚伊。可是一个可怜的 *Ostentatious* 女子，终于被他的外貌迷去，将卖伊的自由了。

将卖去自由的 *Ostentatious* 女子返 P 坡，将买自由的 *Ostentatious* 男子留在 S 埠。他用美貌做买自由的代

价，伊将这美貌代价收纳于无理性的脑箱里，而卖去自由。我又常常看见他在影戏院，又常常看见他跟在几个妇女的后面跑。我奇异他以自己的行为而疑那 *Ostentatious* 女子，莫怪他遇伊而怒呢。我奇异他这样的人，却喜欢谈“如果男子爱一个女子，一定要爱到底。”（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新国民杂志·浪漫谈》栏）

按 *Manila Show* 是当时新加坡的一间电影戏院。作者苏正义则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一个散文及诗作者，对于理论研究及翻译工作也很努力；当时似乎是《新国民日报》经济版的编辑，经常有经济论文在该版发表。

（四）

除了叙事作品从素描速写之类发展到注意刻划人物，铺述故事之外，这时候的记叙散文还出现了很多描写本地的景物胜蹟、风土民俗的游记。这也是马华文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类游记，当时以一位笔名叫小髯的写得较好；譬如下面节录的他的一篇《檳城赛宝节之花花絮絮》，不但题材新鲜，文笔也颇生动——

废历的正月十五日，社会上的旧人物称之为元宵节，但是这里（檳城）一般人有称它为赛宝节的。什么叫赛宝节？怎样赛呢？我来用分析法，把它逐条地写出吧。

一、与赛员 都是大资本家的妇女们；尤其是一辈青年

的未婚者。

二、装束 脸上扑得很白，假使把她的粉刮下来，至少可以抹两双白帆布的鞋子啦。所以有的迷着眼，就似割发代首里的曹孟德；有的突眼的，好比花蝴蝶里的元四开了。伊们的髻发，是马来化的，再套上一顶莲僧式的金冠，煞是好看。穿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红红绿绿，争奇斗胜。胸际佩的，耳指上戴的，非耀目的钻石，便是名贵的珠玉，每人至少有千元的首饰。那些金呵银呵，那里还有出场的资格呢？一般穷措大见了，真是要咋舌不已哩。

三、期限 十四日为预赛期，这天并没有全体出席，所以不十分热闹。他们的比赛规则倒也特别，与众不同的。如果预赛不录，明天仍旧可以加入决赛，并不取消比赛的资格。因此有些人在预赛时自知落入后者，回到家里拼命的想法，买的买，借的借，希望在决赛时得个第一。这样的人听说很多哩。十五日为决赛期，这天的晚上，人山人海，车马鳞连，噪声如海洋里怒涛的澎湃，灯光如天空中雷电的闪烁，可算热闹极了。其集中点在关仔角（海滨），其次为土库街和中街。但是在这两条街，只可以经过，不可以停留的，然而两旁的观者，不亚于海滨。并且各店各户门首，特地添装临时电灯和煤气灯，以助目力的不足，有的凭楼下眺，有的倚榻静观，人头拥挤，行经其地，疑是在无锡的惠泉山大街，第不知相隔千万里咧。十六日为徐兴期，与第一天相仿，与赛者大都是坐第二把椅子的。但是另有一派加入游行。这派的目的，并不是比赛，是一种广告性质，不过招徕

主顾吧了。

.....

六、评判 她们并不抱锦标主义，所以不请公正员来批评优劣。这样可以免去争论，破除意见，完全凭一般看官公众品评。这个是很好的法子。我希望学校里举行联合运动会，很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就不会起冲突，生恶感了。

七、目的 据人家说，她们的真正目的，还不是显宝贝，比贫富；而在选择配偶，所以出游者大都是十七八的未婚女郎。因为她们平日难得机会出门；既少出门，就不易与异性接触，于是乘这赛宝节，装得象西施一般，引人视线。男子呢，坐着摩托卡，跟梢的跟梢，静坐道傍注视的注视。倘有如其意合其心的，马上把车后的号码记录下来，事后从事调查或采访。如果询问确实，就央人作媒。失败者果有之，而成功者也不少。赛宝节的内幕是这样。

八、结束 看了上面的记载，就可以知道赛宝节的内容了。总括的说起来，她们借赛宝为名，以选择配偶为实，法子实在好得很。本来，在教育未普及风气未开通的地方，这也莫怪有这种现象。社交未公开，所以有这种公开展览的“人人会”。但是人究竟不能和货物一样看待；一生幸福有关的问题，又那可带着投机性质呢？唉！（一九二五年二月廿六·廿七日及三月四日《新国民杂志·谈话》栏）

小髯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一个散文及小说作者，不时在《新国民杂志》副刊上撰稿，生平不详。作品有《回忆》

(五)

抒情作品方面，除了原有的一些感怀伤吊之作外，这时又出现了一类侧重于心理描写的文字。这里可以邱因心的一篇《留别书》为例。这是一个迫于生活，行将离星他去的流浪青年的灵魂的自白，拿来和本稿前引的杨觉非的《哭友人苏君克仪的死》比较，可以见出马华文学散文的写作，在这一方面也同样迈进了一大步。但这类抒情作品数量不多，成绩远逊于叙事作品。

留 别 书

邱因心

记者先生：我走了。咳，人地生疏，一个人往那里去呢？真是茫茫大陆，无我立足之地。我此去前途是无着处，行到那里，就到那里。沦落星洲，已过半年分利的生活了。咳！我与人一样是个人，眼睛看得光与暗，向人家拍马屁的话，也晓得嘻嘻的装着笑容；虐待我下一级的人，也晓得沉下凶恶的脸对他们哼，……有时到穷极无聊的时候，也晓得想想一个法子，借人家的钱。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失业的流氓，我是受上帝虐待的百姓。

哦！我是中学一个毕业生，我只晓得提倡教育，干教育者的活。咳！中国的教育家，只晓教人读书，只晓设立学校；读书以外的工作，是不应该做的。

中国人的心理，提倡教育，是优秀名誉！提倡开工厂，

使失业流氓有职业，这不是好事？不是救国的方针吗？失业流氓，至山穷水尽，末路临头，最后一步，就是投军。中国的军队与土匪，有分别吗？中国近来最进步者，无如军队之速。一场抢一场，一乡过一乡，一营又一营，死一千，来两千，这样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来日的中国将是“有田无人耕，有纱无人织”，这是不免的，这是将来的，不久了，不久了。

记者先生！我不是做时髦恋爱梦的青年，也不是萎靡不振坠落环境的青年。我是经过人的生活，把所得做我的研究资料。我不肯象人家，因为耻隐其自然，摧残自然的神。我愿把我高尚的人格，宝贵的人生，牺牲作社会研究的标本。所以我愈受一切的虐待，我的智识进步愈速，所得学问愈多。我现在以为痛苦越受多，胜利的地位越庄严。奋斗，是我的素志，愈遭非难，愈有奋斗精神。我认清我的狠命奋斗的途径，我是有能力有可为的青年，始终要能够实现我的素愿……。

我深信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牺牲的愿望。我现在深信我来日的胜利。现在正是我的工作时候，未曾经过的，就要经过一回。前途前途，人家不敢当的，我就要争先当去。“拿定我的主见，进进进！同行者，我们都是铁石心。不要畏惧他们，能够狠命奋斗，才是我们的胜利呢。始终不变的路呀，走到路尽头心才休”！同胞，这是我平素唱惯的凯歌。我话说多了，祝你们前途珍重。临行，邱因心。（原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新国民杂志·通讯》栏）

邱因心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一个多方面才能的作者，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写得不错。上录的《留别书》发表后不久，即赴华投军，参加北伐，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四日逝世。噩耗传来，当地同文，咸表悼惜；《新国民杂志》副刊嗣于六月廿七日登出《哀邱因心》挽诗一篇（梦萱稿），并附小序云：“忆及因心，乃一热血有为之青年，抱负非凡，思想新颖。昔愤祖国军阀之专横，几至自杀；曾做一篇遗著，刊留报端。后闻北伐有期，吾辈青年救国之机会已至，遂向余说：‘我将投军从戎，为国捐躯，以达素怀’。不几日，毅然决然而往，迄今不过一年，遽闻逝世，哀哉因心……”。兹将该诗内容录后，以为这位有思想，有抱负的不幸青年多留下一点有关的资料——

我也痛心着残碎的现实，

故同情你的壮行。

又觉得你不安的精神，

临行时曾再三叮咛，

不信热血正澎湃的青年，

竟抱恨而长眠哟，

伤心哉因心！

几次思念你，

当独坐玩波亭；

几次思念你，

当静立在校庭；

几次思念你，

当悲愤着人心；

几次思念你，

当求不到同情。

伤心哉因心，

你愿去长眠？

破碎的人生，

让谁来完成？

唉！我难言的隐痛，

在黯淡的月光柳影下，

留几点辛酸的泪痕。

（一九六五年稿）

早期马华新诗一瞥

(一)

一九二〇年初，当地的诗歌创作开始在报章副刊露面。在这以前，马华新文学几乎全部为“杂文学”作品，诸如散文、杂感、文学性评论等，还很少有纯文学创作的产生。而且很多重要的作品都发表在新闻版的《时评》、《要闻》、《来件》各栏，副刊版的大部份材料则仰给于剪刀，新文学的地位是不巩固的。在这以后，马华的纯文学创作——诗歌，以至小说、戏剧等等，接连出现，不但挤掉了副刊版的很多剪稿，也使到副刊稿与新闻稿的分野逐渐明显，到了一九二三年初起，一般“杂文学”作品终于从新闻版汇集到一些文艺性副刊去，大大地充实了副刊版的内容，促成了马华新文学的稳定的、全面的发展。

马华诗歌创作在当时的涌现，对于文学史来说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新诗在当时是一种完全新创的文学样式，比起散文、杂感、或小说作品更能见出新文学的特点。但严格说来，这时期的新诗，实在佳作不多，水平不高。原因一方面由于诗歌是最集中最凝炼地反映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向来总是易写难精；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整个马华文学都处

在萌芽状态中，诗歌创作技巧是不能一枝独秀的。

这时期的一般新诗，以作品的内容归类起来，主要可以列为五大类；一、写个人向上的愿望的；二、写离别、怀念、及伤悼情绪的；三、写自然现象的；四、写社会现象的；五、哲理诗。如果我们把这几类新诗分别作一番观察，我们就很容易发觉，当时只有第一类作品稍能与时代相呼应，成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其他的四类，除了偶尔出现一二佳篇外，绝大部份是消极颓废，或技巧拙劣的不满人意的作品。

(二)

写个人向上愿望的新诗，指的是那些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讴歌生活，探索真理的作品。这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诗歌创作中最好的一部份。这方面的作者有林独步、胡鉴民、石樵等；其中以林独步的表现最为卓越。林氏的诗作如《恋爱》、《幸福与努力》、《理想》、《活动就是快乐》等，虽然有时稍嫌概念化，却是始终充满着乐观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并且在风格上完全摆脱了中国旧诗词的腔调与辞藻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奔放不羁的姿态，因而给予当时的读者以深刻的有益的影响，为马华的诗歌创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

胡鉴民的水平也不下于林独步。他的《奋斗》一诗（一九二二年），指出“现在的世界，有权的作威作福、有钱的汽车马车，无产阶级做奴隶做牛马”，几乎是当时的芸芸作者

中唯一具有阶级观点的诗人，可惜作品的产量比较少些。

石樵也写了一些比较优秀的诗作。下录的《我将讴歌谁呢》（一九二三年初），赞颂“劳动”与“爱”，虽然不象胡鉴民的思想那么清醒，但也和五四初期的时代思潮差距不大。

我要做一个讴歌者

但是我将讴歌谁呢

我将讴歌神明吧？

神明创造天地。

但是神明呵，

我没有见过你！

我将讴歌自然吧？

但是自然呵，

你给我们光明，

却又给我们幽闭。

你给我们伟丽，

却又给我们毒秽！

我将讴歌人生吧？

但是人生呵，

残忍而无理！

我将讴歌死吧？

但是“死”呵，

你又在那里？

我要做一个讴歌者

但是我将讴歌谁呢

哦，我要讴歌那认识我的！

我要讴歌——

那给我们光明，

不给我们幽闭；

给我们伟丽，

不给我们毒秽的。

我要讴歌——

摧陷那残忍与无理的！

哦，让我讴歌“劳动”吧！

让我讴歌“爱”吧！

让我讴歌爱的劳动，

劳动的爱吧！

哦，爱的劳动，

劳动的爱呵，

你认识我！



你给我们光明，
不给我们幽闭；
你给我们伟丽，
不给我们毒秽；
你摧陷那残忍与无理！

哦，爱的劳动，
劳动的爱，
我讴歌你！
我讴歌你！

(三)

写别离、忆念、或伤悼的作品，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最热门的诗作。其中以“赠别”，“送行”之类占大部份。当时星马的出入境条例比较简单，一般华人也以侨民或旅客自居，尚未有落籍的打算，因而作者们来来去去，流动性很大。那些由中国南来者，很多住了三两年便纷纷离去。有的奔丧归里，有的得意还乡，有的赚得一笔旅费，到欧洲去留学；也有的不堪失业流浪的生活，转赴荷印各地另谋出路。那些在当地出生或成长者，情况也同样的不很固定。由于当地没有高等教育设施而赴华升学的固然不绝如缕，激于青年热忱前往参加中国北伐革命的也蔚然成风。这些情形，就给诗人们提供了许多题材，产生了大批描写离情别绪的作品，诸如《送冯君紫罔往法国留学》（子淳）《送蓝关隐

士归国》(吴自知)、《送华君鄂阳赴法国工读》(芳洲、泰生)、《送因心君之棉兰》(梦萱)《醉别》(邱因心)、《送陈瑞福君之东京》(楚狂)……等等。这类诗作,有的嘉许朋友的远行壮志,有的表扬了离去者对于当地的诸多贡献,本来该有好些佳篇产生才对,然而大多数的内容反而是不健康的。例如何心冷的《带了我底心去吧》(一九二三年三月廿八日《新国民杂志》),写得缠绵悱恻,儿女情长,应该说是一阕新的《惜分飞》——

带了我底心去吧,
我爱!
你不带去时,
恐怕它要没处安放了。

带了我底心去吧,
我爱!
要你紧紧地握着它,
不然心上的裂痕要开了。

带了我底心去吧,
我爱!
将它藏在你的胸前,
也许能减少些别离的苦味哩。

带了我底心去吧，
 我爱你！
 你要不带它去，
 那么就将你的心留着伴它吧！
 忆念性质的诗作，在那时候也是相当流行的。这和上述的送别诗之类可以说是同一内容的两种表现形式。朋友亲人，骊歌送别；两地睽隔，遥寄相思，一样是离情别绪的产物。加以怀人念远，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的命题，新的诗人仍然喜欢采用，因而这种作品也就成为当时诗坛的热门货；如惟真的《忆友》、曹世森的《忆》、德徵的《回忆》、黄珍吾的《寄甲埠的朋友》、苏正义的《片刻的印象》……等都是。

忆 友

惟真

我亲爱的朋友，
 我和你分别久了！
 我本不愿和你分离
 那知道竟离开你了。
 恶环境的压迫，
 衣食费都没着，
 那能不和你相别？

我亲爱的朋友！

四年多了，

天边地角，
那鱼儿和雁儿，
总不常泅到这里，
为我们递递情愫，
慰慰我们的相思。

回想着当时共聚的情景，
那能不使我怀念你，
但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人生那有不分离的事？
男儿有志各东西，
岂可象那鹿豕，
困守在圈子里？

我亲爱的朋友啊，
我们的精神是永不分离！

悼唁伤吊之作，在当时的新诗园地也占了一角重要的位置。那时候，正是中国大革命的时代，革命志士壮烈牺牲，前仆后继；而诗人们所处的环境又是一个苦难重重的社会，丧乱夭殇的事件同样普遍，因而这类作品也就分成了两部份。一部份是为那万人景仰的英雄烈士所唱的挽歌，如《黄花岗纪念》（心声）、《悼孙中山先生》（新晓）、《悼廖仲凯先生》（卓秀）……；另一部份则是诗人们对于他们的

亲友故旧的缅怀哀吊，如《哭母》（张应真）、《万年如斯了》（苏正义）、《哭同学苏君燕山》（刘寿山）、《哭石莲君》（郭乐仙）……等等。前者大多写得慷慨悲凉，振奋人心，例如卓秀的《悼廖仲凯先生》——

哎哟！先生你竟死了。

你为了正义而牺牲！

你是劳农团体的领袖，

无产阶级的导师，

你的死是弱小人们的不幸，

我怎能不表示深切的悲鸣……

哎哟，先生你死了

你葬在那里？

你葬在利己主义者的欢笑里，

你葬在爱好光明的人的心灵里；

你葬在弱小人们的哀悼里，

你葬在热血沸腾的洪潮里！

……

但这种产品为数甚少，更多的是与此相反的后一类，常常写得辛酸凄楚，欲使读者一洒同情之泪；例如发表于《新国民杂志》副刊的张应真的《哭母》——

娘亲呵，

你与世长辞了么？

你安忍撒下孩儿在这里悲伤？

娘亲呵，我仿佛听着你的声音：

“儿呀！——

你离开我十年了，

你知道你的母亲在沉疴中，

还在思念你吗？”

娘呵，我仆仆风尘

我羁留异域，

我菽水未报；

我报的是：

凄切呜咽的笛声，

和槟岛海边的涕泪。

娘亲呵，

你与世长辞了么？

你还未给孩儿见过一回病容！

娘亲呵，我梦里还听着你的声音：

“儿呀！——

我不见你面很久了，

你要快些回来呵！

你不给我再见一面，

我死也不瞑目。”

娘呵！我奔驰海外

我一事无成
我春晖未报；
我报的是：
南柯乡里的梦魂，
和仰天太息的吁气。

娘亲呵，
你与世长辞了么？
你这样空劬劳了一世？
娘亲呵，我耳边犹记得着你的声音：
“儿呀！
你此去三两载，
便要一次回来省亲。”
娘呵！我劳瘁半生
我夙志未达，
我亲恩未报；
我报的是：
口里频呕的鲜血，
新闻纸上的哀词！

《新国民杂志》的编者曾在这首诗的篇末附按语云：
“此如月下鹃叫，如塞外猿啼，一字一泪，蓼莪篇不是过也，诚令人不忍卒读。”可见这是当时一首很合该刊编者的口味的挽诗。

(四)

除了上一节介绍的写别离、怀念、伤悼的情绪的诗作之外，另外的写自然现象，写社会现象，以及哲理诗等三类作品，也都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所常见的。

写自然现象的诗作，主要的是一批风景诗和纪游诗，如《舟行晚霁所见》（思埃）、《中秋夜》（景荣）、《晨曦》（苏正义）、《丹戎隅海沿》（柏年）、《朦胧》（沈楚卿）……等。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描写当地的风光景物的篇什。因为由此可以见出马华先进诗人，对于他们所生活着的土地一早就产生了一种异常深厚的感情，说明了后来的一系列“本地色彩”，“南洋文艺”的提倡，是有它们的更长远的源流以及更坚实的传统。例如柏年的《丹戎隅海沿》一诗（一九二四年三月廿日《新国民杂志》），叙写诗人与一批朋友——段远谋、江希志、陈渭南、陈永春、洪文兴、卓清渠、卓开国等在星岛水滨载浮载沉，自由自在的游乐，就象陶醉在自己的乡土上一样。诗人虽然表示“不愿再见灰色都市之丑”，亟欲破浪乘风而去，但那是由热爱大自然出发，由健康的思想感情出发，完全没有青衫落拓，游子飘零的颓飒情绪——

海风清，

海水平，

迷雾遮住了太阳，

不放射一些光线，

多么幽寂而静穆呵！ （四）

游泳！
游泳！
亨亨哈哈的笑声，
披披泼泼的水声，
引起神经的快感，
洗净人们的脑筋，
和皮肤一般的清洁。
舢舨是一只二艘，
海鸥是三群四群，
渔父曳网而高歌，
古树迎风而摇曳，
都是大自然的表现。
游兴方浓，
风云忽起变化，
指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哎哟，拳头大了呵，
打得我们肩背痛了
大家拼命拿起衣衫
一溜烟跑到破屋旁避雨了
我呢——和段君，
仍然鼓着余勇，
继续游泳。

进呀，进呀！
横竖是要破浪乘风，
那怕甚么风和雨！
风越大，
浪越粗，
兴味越发浓厚！
身儿——飘飘，
心儿——摇摇，
浪儿——汹涌；
哦，我的心醉了，
我不愿再见灰色都市之丑呵！
我情愿逐着波涛，
奔流到南海，
奔流到太平洋，
奔流到……
长期度着海的生活。



“唉呀，险呵，
上岸吧！
大浪象山崩一样翻来了！”
也吧！
算了吧，
冒险是相机的尝试
不配在没代价的所在！

不过，这一类显得健康开朗的作品，比较起来还是属于少数的。更多的作者倒是抱着一种“沦落人在天涯”的孤寂的心境，触景伤情，见月坠泪，因而有很多风景诗便写成了感怀诗，吟咏的是山光水色，重点却在于思亲怀乡；感客旅之萧条，悲人生之寡欢。诸如《哭残花》（失钩）、《登高感概》（黄天声）、《旅况见月有感》（无己）、《船中杂感》（新晓）……等是。其中无己的《旅况见月有感》（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新国民杂志》），可以说是很有典型性的一首——



可爱的明月，
一轮横空，
光亮亮的照到我的旅舍。
哎哟，
汝不是聪明的么，
不然怎知道我的寂寞而来伴我？

可爱的明月，
我在甚处都遇着汝
但是人地境况殊异
现今已不象故昔了
哎哟，
汝能够常圆，
怎不使人们和汝一样？

可爱的明月，
究竟汝是什么？
汝使人家快乐，
亦使人家烦恼！
哎哟，
我在乐融融时看见了汝，
精神上觉得愉快；
如今在这寂寞的旅舍看见了汝，
却增加无限的感慨！

(五)

写社会现象的作品，大部份是些简短的叙事诗，内容多在揭示社会的缺陷，生活的悲苦。譬如失钩的《旅客》与《人家和我》，反映了背乡离井的漂泊者的孤独凄寂；子淳的《白雪中的一个孤儿》，诉说了流浪街头的儿童的孤苦无告；楚狂的《失望的生命》与《一个自尽的少年》，则描写了失业潦倒的青年的厌世轻生。当时一般诗人因为还没有接受新的世界观的熏陶，未能透视社会的远景，所以这些作品的调子都十分低沉，给予读者一种灰暗窒闷的感觉，且看那首楚狂的《失望的生命》（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新国民杂志》）——

月色迷蒙中，
他倚在街灯下不住地祈祷；

灰白的脸儿，
几乎没有一点生气

寒露一点点落在他的外套，
冰也似的风儿一阵阵吹来，
把落叶刮得怪响，
他好象没有觉得呵

他眼睁睁注视着骑楼下的丐儿
虽穿了一件不堪蔽体的破衣，
却鼻息呼呼地甜睡，
把一切的烦恼忘记了，
可怜呵，
他彻夜站在那里，
不由得掉下泪来。

喔喔喔……………
天欲亮了，
街灯熄了，
月姊也不见了，
只有寥寥落落的晨星，
来做他寂寞的伴侣

工厂里的汽笛，

不停地呜呜叫，
工人们跑过他的身边，
还以为他是一个贪懒的瞌睡虫呢。

失望的生命呵，
死了吧！
这微弱的声音，
仿佛是他最后的希望。

有一小部份属于讽刺或谴责性质的，态度倒是比较积极，节奏也比较轻捷，没有上述那种暗淡沉闷的色彩。这些作品的讽刺或谴责，主要是针对当时华人社会的庸俗，保守，风气闭塞等等。例如下录的欢乐的《一年过两个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廿四日《新国民杂志》），就是抨击一般华人既已采用公历却又大过其旧历新年的习尚——

一年过两个年，

可笑也可怜。

你看他们乱赌钱，

抽大烟，

饮花筵；

还多么忙着把年糕煎，

恭维话连篇，

可笑也可怜！

一年过两个年，
可笑也可怜。
说什么人事不便，
勿卸仔肩。
你看他们祝颂得倒倒颠颠：
宅第连绵，
良田万顷。
可笑也可怜！

这种讽世贬俗之作，限于作者的思想水平，显然也有它们的缺点：琐屑、浮面、不能深入事件的本质，但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较有教育意义的了。然而就连这种稍为健康一点的短诗，比较来说，也还是少之又少的。

(六)

哲理诗所写的也常常是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但重点并不在于描绘风景，抒发感兴，或者讽世贬俗，反映事象；而是在宣示作者们所发见的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或他们所欲阐扬的对于生活的态度。这一类作品当时有冼玉贞的《自立》、失名的《烦闷》、徐笃谦的《纯爱之神》、苏正义的《露珠与玫瑰花》、维祺的《闭眼远望时》、见谷的《结网后》、无己的《火车里嚶嚶的声》……等等。

这批哲理诗的思想内容，有一些倒是值得重视的，但表现的方法却不大高明。它们最常见的缺点有两种，其一是意

境浅露，缺乏深度；如冼玉贞的《自立》——

哈哈！春天到了，
院子里的花朵朵开放，
红的黄的，
白的紫的。
灿烂悦目。
蜻蜓、蝴蝶、蜜蜂、小鸟们，
纷纷跑来会她；
花呵，你们的香气。
真是可爱得很！

日光渐渐从海边隐去，
招了洁白的月姊出来，
花妹朵朵点首欢迎，
蜂蝶小鸟也都愉快
一会儿，
人们个个都睡着了
种种声声色色都没有了，
小鸟们还依依不舍
终于双泪涟涟地说
花呵，我们要去了
明天再见吧！

秋天初启，
没良心的风，
吹得可怜的花满地乱落。
唉，花呵，
你们的月姊笑笑地在探望着，
你们的情人——
蜻蜓、蝴蝶、蜜蜂、小鸟们，
那里去了呢？

一朵初生的梅花微笑地说：
我亲爱的花同胞呵
你们是一种玩意儿，附属品，
若是你们有自立的人格和努力的精神，
也不会有这个日子了。
你们现在已死在泥中，
请你们自由的死吧
但要告诉你们的子孙，
使他们觉悟才好！

这诗以花开花谢，狂蜂浪蝶始乱终弃来说明人贵自立，不要做人家的玩物，这种表现方式显然是太陈旧了。

这时期的哲理诗的另一个普遍的缺点，则是借喻取譬，常常显得拟于不伦；例如苏正义的《露珠与玫瑰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新国民杂志》）——

露珠跌下玫瑰花心里，
伊在那里熟睡。

太阳下山去，
月亮悬在天空，
露珠醒来一惊，
伊在玫瑰花床被关住了。

“我给人们关起来了，
快来救我吧！

我看不见星星了！
小雀呵，蝴蝶呵，蜜蜂呵，
快来放我自由吧！”

但是他们都熟睡，
伊喊少了多少声，
就沉下玫瑰花牢狱去，
那美香的气味，
又催伊人睡。

在这黑暗世界里，
在这玫瑰花牢狱里，
时而听见伊的喊声
时而声音忽然中止

光明的太阳出现了
先打破这黑暗世界
再打破这可憎牢狱
伊也自自然然地，
情愿在那
明亮的日光下溶化了。

露滴花心，一般的概念是形容情意相投，欢愉融洽，似乎不能翻成陷入牢狱，失去自由，从而把露珠作为一个身系囹圄，追求光明的壮士的形象。

写得较好，内容和形式显得比较统一的作品，只是偶然间出现一两首而已。譬如无己的《火车里嚶嚶的声》（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新国民杂志》），描写火车开行时婴孩的震惊啼哭，指出人生旅程上免不了崎岖颠簸的道理；平淡而不落俗套，深刻而出于自然，就不失为一首有水准的诗作——

火车驶得很快，
把乘客摇动得非常厉害。
可怜一个小孩子，
不能忍受这种痛苦
突然在车里嚶嚶哭起来。

嚶嚶的声，

好象哀求火车快些停止。
但那无情的火车，
却照样向前驶去。

五分钟过去了，
嚶嚶的声还是依然。

十分钟过去了，
嚶嚶的声更加剧烈。

哎呀！

嚶嚶的声猛击我的胸膛！

小孩子的哭声，
和她母亲殷勤的安慰声，
可真使我伤心。

孩子呵，
你太难为你的母亲了，

她躯体所受的震荡

比较你还狠；

如今加上这精神的窘迫，
教她怎能当得。

那孩子真是不懂情理，
知道我为了他伤心
更加要使我伤心，

那呜呜的声越来越大了，
难堪！难堪！

火车驶得轰轰叫，
把我唤醒过来了，
仿佛听它说着：

聪明的人呵，
你为甚自寻苦恼？

前程遥远，
如不奋力前进，
怎能容易到达呢？

一下子笛声呜呜响，
火车停止，
那讨厌的摇动没有了，
小孩子禁住呜呜的哭声，
我也就安然如昔了

此外，这时期还有一类关于身边琐事的酬酢赠答之作，
如《题照片》、《贺新婚》之类，内容更无可取，不在我们
评论之列了。

（一九六五年）

萌芽期马华小说补记

(一)

马华新文学的小说创作的陆续出现，是由一九一九年抄开始的。但在最初的两三年间，报章副刊上发表的小说，大多数还是转载的或文言文的稿件；当地创作的新体小说，只是一鳞片羽，少之又少。到了一九二二年以后，这些转载的或文言文的稿件，其地位就逐渐地被当地的新文学创作所取代，不象前此那么充斥于各刊物的《说丛》栏或《小说》栏中。一九二四年十月，《新国民日报》的《小说世界》出刊，完全废除剪稿，并且减少旧文学作品，马华新小说创作在开疆拓土上又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为下一个时期的新文学的扩展繁荣奠定了强固的基础。

虽然这时期的马华小说创作，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许多缺点，但个别的作者值得我们重视的还很多，如林独步、陈桂芳、李西浪、李垂拱等都是。此外，较可注意的有邱志伟、冼玉贞、郭乐仙……等。这些作者都相当多产，但水平不很固定。同一个人的作品，有些颇见精思，有些却又十分幼稚。因而，欣赏这些人的小说，须费一番选择淘汰的功

邱志伟的若干千字左右的短篇，如《一个深思者》、《一个灰生闷死的青年》等等，大都写得很差；不仅是一些概念化的报告，而且连一个故事的轮廓也没有构成。但他那篇连载小说《长恨的玉钗》，却就没有这种缺点。《长恨的玉钗》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起，在《新国民杂志》副刊陆续刊登一个多月，篇幅比林独步的《同窗会》更长。小说的主人翁是三名友谊深厚的女同学——玉钗，惠芹，秋芬。她们常常在一起温课打球，赏菊论诗，渡过了一个时期高雅恬适的少女生活。其中玉钗尤富于感情，不时关怀着姐妹们的幸福前途，给予种种的方便和协助。后来秋芬与一青年蒋清洲相爱，婚事受男方家庭所阻，双双殉情。玉钗因悲伤过度，继之病逝。惠芹雁行折翼，也无生趣，大学毕业后，献身教育工作，至死不论婚嫁。

这个创作的现实意义在远远不及林独步的《同窗会》与李西浪的《蛮花惨果》，然而描写细腻，引人入胜，是作者一篇最有代表性的力作。现在试举秋芬逝世前的一段文字，以见作者对于高潮的处理及氛围的渲染的着力——

这天惠芹才过来，在二楼看陆氏正吩咐梦之取药去，一行上楼梯，一行问道：“二婶，昨晚那药水吃下怎样？”陆氏一边回头道：“我看昨晚虽静些，到底迷迷糊糊得慌。”说到这里，眼泪已偷偷滴衣襟了。

惠芹走进寝室，一看玉钗坐在床沿弯着腰，牵着秋芬的手，面对面流泪。玉钗看惠芹进来，便向秋芬道：“妹妹你

看这个是谁进来呢？”秋芬躺着迷迷糊糊，伸手向玉钗手里要手帕。玉钗知她要拭眼泪，忙得把手里的手帕替她拭一拭，她才无精打采的，很微弱的说道：“是芹姐。”说完，眼中流不尽的泪儿，一粒一粒跳在席上，口里象电船走时的烟筒出气似的。又续一续气，才道：“白白你们疼我一场了。”说了把头在枕上翻来复去，此时象有千言万语，不能说出的苦。惠芹早已挨近床沿，弯着腰，手往被窝里，捉着她的手，哭得泪人一般，把这寝室的空气，充满了伤心悲哀的微细哭声。时近掌灯，惠芹又安慰了一场，又劝玉钗道：“你也该顾顾你自己的身子，别一味守着，伤心哀哭。”说了一遍，才告别回自家去。

惠芹回家，也不能用晚饭，只告母亲，要自己先躺去。但是母亲也知道她的好同学病重，且她三人虽是手帕交的姐妹，平常来往，比同胞的还要亲爱些，如今也怪不得如许伤心。

惠芹一夜在床上翻来复去，终不能合上眼睡去。时近五更，仿佛秋芬走来眼前，满面泪痕道：“芹姊呵，我要去了，我要找我心爱的……”。说完，大家拉着手痛哭。她母亲倒给她哭醒来，忙得叫道：“阿芹，阿芹，你哭什么呢？”惠芹不觉惊醒来：“呵，是我做梦呢！”把席上一摸，冰冷一片，一想才知刚才梦中事，巴不得就过去看秋芬。望外一看，窗纸已白了，天也亮了，忙起身，随便梳洗了，走过来，才一进门，闻楼上哀哀不绝的哭声，知道势头不好了，那时几乎爬不上楼梯了。好容易爬上来，见陆氏抱一个死了的秋

芬，在哭一声儿，一声肉，哀哀不绝，鼻涕泪珠，满面垂流。对面床上一个泪人般的玉钗，和梦之等，都在痛哭。惠芹看了，挨近秋芬，也哭得死去活来。陆氏与梦之一边哭，一边安置后事。玉钗连哭了一夜，嗓子哭嘶了，神也倦了，如梦如醉，躺在床上，今见惠芹来了，不觉更比早晚哭时万般伤心，似乎一个心肝已震破了。惠芹守着，次日出葬了，下午才回去。（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三——廿四日《新国民杂志》）

（二）

洗玉贞，或署玉贞女士，所作多属一千余字的短篇，但故事相当完整，内容也较有意义。如《原来是他》，写一对青年男女，心心相印，欲谐白头，女父因两家先代曾经结怨，且嫌男方贫寒，门户不当，乃拒绝论婚，并设法把他们拆散，结果这对爱侣双双自杀殉情，构成了罗密欧朱丽叶式的惨剧。又《人间地狱》则写一个陈世美型的男子王老三，南渡星洲，四年未寄家信，其妻在乡下无法生活，便挈带三个儿女到海外来寻夫，不料王老三已在此间另立家室，享其艳福。那母子四人，于是沦为乞丐，在街边饭摊向人讨食。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海外寻夫的故事，开了后来这一类小说戏剧的先河。

《一个不孝的女儿》也是作者写得较好的一篇作品。内容叙述一个年轻的女子伍爱琼，因反对父亲增加屋租加重工人的负担而被斥为不孝。这是体现五四初期的新思潮的问题小说。当时由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发皇滋长，许多传统的伦

理观念，道德标准，都被提出来重新估价。这篇小说所提出的是“孝”的问题。下录是伍爱琼与乃父正面冲突的一幕

那时伍翁昂然的跑进来，他大声喊道：“爱琼，你刚才讲的话我听到了。他们是下等人，应该劳苦的，你还要去怜悯他们吗？他们就是苦到死，又与你何干？你的父亲再想去增加些租钱，现在还没成功，怎么你不可怜你的父亲？”

爱琼听了说：“父亲，我最亲爱的父亲！你的学问很好，且你从前做过官，谅你历过的事情也不算少，你应该尽国民的一份责任去改良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才是。讲到加租钱一层，女儿是极不赞成的。我们试想一个工人，终日忙碌，所得的薪水支出甚重，柴也要，米也要，儿女的学费也要，假使你再去加些租钱，你叫他们怎样过日呢？加租一层不是一种很大的罪恶吗？”

伍翁说：“他们够不够用与我们何干？发财那个不想的！难道就是一种罪恶？”

爱琼答道：“父亲，你抱着这个宗旨比较盗贼还坏！”

伍翁听了大声骂道：“不孝！畜生！你的狗胆很大，你敢叫父亲做盗贼吗？……”

爱琼听了这一番话，急得浑身冷汗地离开了伊的父亲，到自己住房里面，扑地在床上哭了一夜，不能入睡，心里说：

“我究竟是不是不孝和畜生？我的思想究竟对不对？别多讲了，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我决定了，我自己一

面奋志求学，一面尽力去打破这个龌龊的社会。生也好，死也好，我的目的总是这样！”（一九二三年五月廿四日《新国民杂志》）

（三）

郭乐仙的小说也大多是一二千字的短篇，思想内容方面似乎还不及冼玉贞，但描写上看来比较深刻一点。他的比较出色的作品有《一个可怜的女子》及《久仰》等。前者揭露盲婚制度下的悲剧，后者则抨击世俗社会的虚伪造作。

下面是《久仰》的后半篇，写一个辍了学的少年，跟着族叔去拜见一个商行的经理，不自觉地说出一句恭维话，投合对方的心理，得到了一个职位，然而少年人自己却意识到“变节”的愧作与“受侮辱”的悲哀——

……时间到了，他跟着族叔到林经理那边去。族叔和林经理寒暄了几句套语后，就谈到他上去。

“林先生，我的侄儿想在这里的商店学生意，烦你介绍个妥当些的位置。”族叔指着他向林经理说。

“他为什么要出外学生意？这样年小的人！”林经理瞧他一瞧向他族叔说。

“是的，他原是在学校念着书哩；但是兄弟姊妹太多了，他比较别个年纪大，就不得不早些出外学生意，得些商业知识，好做未来谋生的基础，还可为家庭方面省一人的费用。他的父亲这样打算呵。”族叔解释了，接着喊他，指着

林经理说：“这就是林俊成先生。”

“久仰！久仰！”他在旁边看他们谈话正看得出神，蓦不提防听到族叔的话，连忙脱口说出这一句两叠的恭维话。但是其余的，他空洞洞的肚里就制造不出来了。

“哈哈！好个伶俐识礼的孩子。”林经理很得意似的向族叔称赞他。

他这时面红耳赤象火烧一般了。

直到他们辞别林经理出来，他一路追忆他对着林经理说的“久仰”，就联想起：我从来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林俊成”三个字，我真虚伪极了。但他想起林经理并不怪他，还称赞他是个伶俐识礼的好孩子，越令他不能了解这是一回事。

不多时，林经理果然介绍他进一间杂货店去学生意了。“久仰”两个字的代价，可算是很值得了。然而变节做过虚伪的他，终于不觉得快乐，反而以为林经理是有意侮辱他呢。（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小说世界》第八期）

其他作者的作品，较为上乘的有黄开喜的《蝴蝶梦》，写一对表兄妹的恋爱故事；蝶影的《玉碎香消》，写一个女学生被骗沦落妓院而以死自守；邱国基的《生命历史上的一页》，写一个知识青年自杀前的悲愤绝望的心境；刘寿山的《月夜》，通过两个工人的月下谈话，暴露了当时的产业工人在殖民地厂商残酷剥削下的非人生活……………。

（一九六五年）

小休录

方修著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

51-A, Lorong Limbang
Singapore, 25.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日期：一九七八年九月

书号：012/78

定价：2.00元

本书作者其他编著

1. 论小品散文 (1957)
2. 马华文坛往事 (1958)
3. 《红楼梦》简说 (1960·4)
4. 避席集 (1960·9)
5. 文艺界五年 (1961·9)
6. 马华文艺史料 (1962)
7. 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
(1962·2, 1964, 1965·6)
8. 文艺杂论 (1964·6)
9. 文艺杂论二集 (1967·10)
10. 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1970·11)
11. 马华新文学大系 (十巨册) (1972)
12. 长夜集 (1973·2)
13. 轻尘集 (1974·4)
14. 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 (1974·5)
15. 马华新文学简史 (1974·7)
16. 沉论集 (1975·4)
17. 马华新文学史稿 (修订本)
——《马华新文学大系》附编上、下
(1975·10, 1976·12)
18. 文艺界又五年 (1976·3)
19. 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1976·3)
20. 人物篇 (1976·9)
21. 炉烟集 (1977·6)
22.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 (专题研究报告) (1978·2)
23. 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 (联合国资助·日本出版)
(1978)



书号：012/78

定价：2.00元